



TIAN
JIN
SHI
ZHI

敬请各界朋友监督——

在内容上,提高学术性、知识性、
资料性、可读性,加大信息量;

在形式上,活泼多样、美观大方、
图文并茂、新颖明畅;

在文字上,精心校对、求真求实、
字斟句酌、力臻完美。

目 录

特 载

《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3）

廉洁文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天津开展的廉政建设 …… 付琳雅 徐 勇（7）

红色记忆——平津战役纪念馆里的廉政故事 …… 祁雅楠（13）

志鉴交流

天津市旧志整理浅析 …… 刘 蒙（16）

燃烧自己 照亮航程——评《天津市志·北海航海保障志》的编修特点

…………… 赵继华（23）

浅谈北辰区部门志、专业志的编修 …… 赵 菁（29）

史学百家

天津俄租界的代管与接收 …… 曲振明（32）

天津早年的冰上运动 张绍祖 (38)

张謇与天津 (下) 葛培林 (45)

明代天津卫“黄回子”辨析 尹忠田 (53)

志述津沽

赵生甫与城南诗社 侯福志 (57)

说说天津的三个“官房村” 王庆普 (60)

信息动态

市级动态 (63)

区级动态 (64)

市档案馆召开《天津市志·地方志志》编修启动会
.....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封二)

天津市档案馆举办“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天津地情资料
丛书”新书首发式 市档案馆年鉴指导部 (封三)

2022年第3期(总第200期)
(双月刊)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编印单位: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
员会办公室

编 办:天津市地方志馆

编印人员:吴爱民 梁 娜

岳 宏 柳 杨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1号增1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58037686

邮 箱:tjsdagdfzg02@tj.gov.cn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

刊型 20210098

承印单位:天津中铁物资印业
有限公司

本期印数:1500册

关于印发《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 (2021—2025年)》的通知

各有关市级单位，各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已经市委分管领导同志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2022年5月26日

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

津志发〔2022〕2号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全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志在建设文化强市方面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结合当前我市地方志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环境与机遇

“十三五”时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全市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全市地方志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存史、资政、育人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五个现代化天津”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十三五”时期发展情况

根据市委部署，完成市、区两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改革，加强了党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实现了档案与地方志工作的有机整合，基本形成上下机构对口、职能体系统一的市、区两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正式颁布实施，为推进依法治志奠定坚实基础。列入全市第二轮规划编纂任务的77部市、区两级地方志书完成出版，2部志书入选中国志书精品工程。实现市、区两级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和“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的目标任务。在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1部年鉴入选中国年鉴精品工程，多部年鉴获奖。名镇、名村志书编修成果斐然，4部志书入选“中国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地方史编著稳步推进，一批高质量地方史研究和地情资料丛书出版。史

志文化“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地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逐步发挥。与北京、河北、山西等省成功举办“京津冀运河文化展”“永定河文化展”，实现京津冀地方志事业协同发展和跨区域合作。地方志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地方志理论研究方兴未艾，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十四五”时期是天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天津地方志工作实现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党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为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的颁布实施，为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的顺利完成，为全市地方志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同时，全市地方志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志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得还不够紧密，地方志系统主动融入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还不够明显，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还有差距；对机构改革后地方志事业面临的新问题还缺少应对招法，各区各部门工作进展不平衡，涉及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地方志工作人员不足，队伍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等。面对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通过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紧贴中心工作，紧抓重点领域，补齐短板弱项，突出优势特色，推动全市地方志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进一步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全面开创具有时代特征、天津特点和全国影响的地方志事业新局面，充分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作出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牢记地方志工作的政治属性，把党的领导贯穿地方志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通过编修和开发利用地方史志成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自信提供丰富、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

坚持全面发展。将求真务实、守正存真精神和精品意识贯穿于志书编纂、评审、出版全过程，严把质量关，编纂出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的信今传后的地方志成果。围绕中心，动员社会力量，在修志编鉴著史主业基础上统筹兼顾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方志古籍整理、学术研究和方志馆建设、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

坚持改革创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编修地方志的优秀文化传统，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与时俱进，勇于改革、敢于创新、善于作为，思想上不断有新突破、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工作上不断有新举措。

坚持修志为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拓宽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广度，形成修用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发挥地方志贵在史识、重在致用的重要作用，推进地方志成果社会共知，提高地方志资源社会共享水平，使地方志成为天津重要的“文化名片”。

三、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

(一) 总体目标

地方志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新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有序开展，市、区两级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持续巩固，史志文化建设成果更加丰硕，市、区方志馆建设全面推进，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更加深入，人才队伍素质有力提升，基本建成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存史资政育人作用发挥更加突出，地方志事业的社会影响力显著增强，整体工作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二) 主要任务

1. 推进各级各类志书编修工作。全面总结第一轮、第二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经验，科学编制第三轮修志规划。制定《天津市部门志书和专业志书编修及审查验收规定》。推动未参与两轮志书编修的市级机关和相关单位开展修志工作，实现市级部门和专业志书编修全覆盖，积极推动区级志书编修工作向区属部门、单位延伸。完成《天津抗日战争志》编修工作，组织开展《天津扶贫志》《天津全面小康志》编修。结合“中国传统村落志”“中国名镇名村志”文化工程，推进乡镇村志编修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围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编修反映天津地域文化特色的系列志书。

2. 巩固年鉴全覆盖成果。科学规划全市年鉴工作，完善市、区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

公开出版”编纂机制。落实季度通报制度，缩短出版周期，逐步实现年内出版。持续开展年鉴手机版掌上阅读资助和“读鉴品鉴”活动，形成常态化机制。制定《天津市乡镇（街道）年鉴编纂出版规范（试行）》，开展乡镇（街道）年鉴编纂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年鉴编纂向乡镇（街道）延伸。在巩固已有专业年鉴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专业年鉴数量。做好“中国精品年鉴”申报评审和地方志（年鉴类）优秀成果的评选推荐工作，实现市、区两级均有年鉴获评入选。

3. 推动地方史编著和旧志整理工作。深入挖掘天津地方史和地情资源，坚持多行业、多领域合作。持续实施《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资助项目。组织开展区级地方史编著工作，力争启动一批、编著一批、完成一批。全面搜集整理存世旧志，分阶段做好《天津历代方志集成》（影印本）出版工作。

4. 加强方志馆建设。全面推进市、区方志馆建设，优化空间布局，拓展服务功能，提升利用服务水平，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馆藏资源建设，拓展地方志资料收集范围和渠道，不断充实志鉴书籍、地情资料、图片、实物等资源，做好馆藏老旧资料保护利用。加大实体馆建设力度，积极改善现有馆、库基础设施环境，依托现有场馆资源，丰富展陈内容，促进档案方志资源共享、服务融合。

5. 加强信息化建设。加强全市地方志数据资源建设，制定全市地方志数据资源标准。以数字方志馆建设为带动，加快推进志书、年鉴资料数字化，力争实现馆藏第一、二轮志书以及市级综合年鉴全文数字化。依托各级地方志网站，充实完善地情数据库，为人民群众提供地方志资料在线阅读、查阅利用等服务，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展示天津地情。

6.提高史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要历史节点,举办方志文化讲堂、地方历史文化展览,制作方志文化专题片、微视频等,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历史文化、地情文化的需求。探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可读性、趣味性比较强的方志读物。继续办好《档案方志参阅》,发挥资政辅政功能。

7.实施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定期举办各级各类地方志业务培训、交流和学术研讨活动,进一步提升地方志编纂人员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发挥《天津史志》期刊理论研究平台作用,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依托档案方志专家库、专家工作室、方志文化讲堂等平台,进一步提升地方志人才队伍素质和能力,培养地方史志研究学科带头人。

8.扩大交流合作。坚持开门修志,落实《京津冀地方志事业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开展互学互访互研活动,推进业务深度合作。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全国地方志系统支援西藏、新疆地方志工作的意见》,做好相关支援工作。采用多种形式,加强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档案机构、图书馆等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增强方志文化影响力。

四、保障措施

(一) **体制机制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全面落实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工作任务,“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市、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职能。市、区地方

志工作机构要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管理与服务,提高地方志工作的能力水平。

(二) **法治保障**。严格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法》,进一步完善地方志工作制度体系。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依法履行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本行政区域内地方志工作的法定职责,依法纠正地方志工作执行不力和违法行为。以业务评估、专项检查等为抓手,大力推进地方志工作规范化建设。坚持地方志工作动态管理机制,定期检查通报工作落实情况。

(三) **工作保障**。各区要将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同经济发展相匹配、同地方志工作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依照所承担的地方志工作职责,明确具体工作机构和人员,保障经费和办公条件,忠实履行记录本部门、本行业发展历史的职责。建立健全地方志工作评估激励机制,对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与个人给予奖励。

(四) **宣传保障**。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大力宣传地方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举措、新成绩、新贡献,推动方志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设计宣传主题,创新宣传形式,广泛进行地情宣传和历史文化传播。不断推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地方志宣传精品,进一步推动形成全社会读志、用志良好氛围。

各区要结合工作实际,根据本规划制定本区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划实施方案。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本规划的落实和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天津开展的廉政建设

付琳雅 徐 勇

每当我们走进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石家大院，里面陈列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展览，都让人感到震撼。300余平方米的展馆空间，通过文献、旧照片和音像资料，还原了刘青山、张子善背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过程。尤其是毛泽东主席关于该事件的批示，展示了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决心。发生在天津的这起反腐案件，被称为新中国的反腐第一大案。该展馆以天津杨柳青石家大院为馆舍，于1991年正式开馆，展出“新中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展览”。该展览馆在2010年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命名为第一批50个全国廉政教育基地之一，承担着廉政教育社会功能的杨柳青“石家大院”，在时刻提醒着每一名党员干部清廉修身。

2021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雨，我们党已经成长为百年大党，带领国家和人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不能放松，还必须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建党101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再次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地区

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重温峥嵘历史，不忘初心，保持定力。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形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这样重要的历史转折阶段，党的廉政建设工作是复杂而艰巨的，不仅需要妥善解决新中国成立前的遗留问题，还要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新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着艰巨的历史任务。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长期执政的党。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建设任务摆在面前，对党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的本领提出了高要求。^[1]解放前，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工厂总数和工人总数在全国20个主要沿海城市中均排第二位。^[2]可见，天津经济恢复工作不仅仅关系着天津人民的生活质量，还关系着支援全国解放和国民经济恢复。^[3]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2] 傅韬、周祖常：《解放初期天津工业生产的恢复》，《天津史志》，1985年第1期，第35页。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其次，客观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许多新解放的城市承受着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经济震荡。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仍在延续，一大批不法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可以说，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也在经济战线紧张地进行。^[1]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指示，指出近两年“增加了党员约二百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甚至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2]

再次，主观上，新中国建立之初，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没有被完全根除，剥削阶级的腐败思想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封建家长制作风、等级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作风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资产阶级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侵蚀到党内。^[3] 可以说，面对历史性考验，党的廉政建设势在必行。

二、党的反腐倡廉思想内容和精神传达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新形势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宣传和教育人民，成为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必然要求。中央强调，确立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

一是强调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不正确的，工人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存在谁战胜谁的斗争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刘少奇就提出了防止党执政之后腐化变质的观点，他强调：“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4]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执政党的廉政问题就已经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了夺取政权后要经受的执政考验，并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5] 1952年天津市干部大会报告中明确强调，反贪污浪费务必反对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是贪腐浪费的温床”。^[6]

二是坚定政治信念，明确政治方向，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周恩来庄严宣告：“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7] 执政党贪污腐化问题产生的关键在于忘记了党员干部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从而把公权视为私产，或滥用权力以谋取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从根本上抓住了反腐倡廉建设的纲要，为党的廉政建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3] 黄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研究》，武汉大学，2013年，第100页。

[4]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页。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设指明了方向和基本立场，也为行使公权力的人提供了思想标尺和行为尺度。1953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工程技术人员会议情况及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对于技术人员，必须采取积极团结、教育的方针，改造其思想，提高其技术，从而为国家建设做更大的贡献。^[1]

三是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的活动公开放在群众的帮助与监督之下。^[2]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思想，并把党和政府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作为遏制腐败现象的重要方式。^[3]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基于对局部执政时期人民监督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提出了由人民群众直接监督政府工作的制度设想，并付诸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在1950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4]在中央人民监督思想的指导下，为动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反贪污斗争，丰富的艺术宣传方式融入天津反腐倡廉思想宣传工作之中，使得宣传工作得到广泛开展。据1952年3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天津铁路分局某支部利用中午午休时间，用唱快板的方式向职工宣传反腐思想。^[5]

四是重视党的建设，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

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6]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2月颁布的《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理论学习不足及经验主义倾向是官僚主义和蜕化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并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1951年4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对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规定了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若干基本条件，并以此作为教育和考察全体共产党员，包括接收新党员所必须坚持的条件。为提高政治水平、弥补思想文化差距，天津积极组织机关干部开展业余文化教育工作，并在工作实施中制定了具体细则，如“为照顾干部国文、数学程度不一致，各校可采取交叉编班制度”。^[7]

三、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实践

（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

新中国初期面临经济困难，但在征收公粮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的不良作风造成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正如中共中央在1950年5月1日下发的指示中强调，很多党员干部工作态度蛮横，危害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针对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必须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整顿干部作风。^[8]1950年5月的整风运动相对比较温和，

[1] 胡维嘉：《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5] 《国营工矿企业在“三反”运动中的宣传工作》，《人民日报》，1952年3月31日，第3版。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7] 《本府关于加强工农干部文化教育的决定》，《天津政报》，1951年第22期，第55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主要采取批评教育和自我反省的方式，及时遏制了泛滥的不正之风和官僚作风。但显然，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绝非一次短期的整风运动可以完成。正如毛泽东在同年9月的一封驳斥信中所书，党员干部出身于人民群众，人民的文化程度和党的政治水平不能寄希望于一次两次的整风运动，而是要依靠经济和教育的普遍发展。^[1]

（二）“三年整党”规划和“两反”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数量迅速增长的党员队伍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突出，一场有计划的党风整顿运动被中共中央提上了日程。在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三年整党”规划分两阶段、双线开展。第一年（1951年）开展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普遍教育；第二、三年（1952—1953年）按照标准把党员划分为四类，进行差别教育和处理；同时，开展定期短时的辅助整风运动。^[2]中共中央重点关注华北地区的地方整党准备工作，并注意将其经验介绍给全国其他地方。全国组工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出两名干部到天津了解天津地委对全国组工会议决议的贯彻情况。1951年7月31日，安子文根据中组部在天津了解到的情况，向刘少奇和毛泽东做了关于天津地委整党经验的报告，汇报了天津地委组织培训整党干部（组织员）和进行整党典型试验的情况及经验。安子文同志关于天津地委整党

经验的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51年8月1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各地地方党委批示转发该报告。^[3]

1951年增产节约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其中东北局成绩尤为显著。但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局党员干部思想腐化的不良风气也暴露出来。同年9月，为整顿党内风气、杜绝贪污腐化行为，中共中央对东北局报送的“两反”（即反贪污盗窃和反投机倒把）运动计划表示肯定，决定将“两反”运动和定期的整风教育工作联系起来并向全国推广。

（三）“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

在“两反”运动的基础上，“三反”的概念首先在1950年10月26日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被提出。^[4]而后到11月20日，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各省级党政组织学习推广东北局的整顿经验，坚决开展“三反”运动。^[5]“三反”运动是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天津的“三反”运动迅速在全社会展开，对市内各级党组织、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进行严格调查，查处了一批有贪污行为的干部，包括中高级干部。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因在公职期间严重贪污和挪用公款，被依法公审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以及曾任天津行署专员的张子善。^[6]党自成立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130页。

[3] 《安子文同志关于天津地委整党经验向中央的报告（1951年7月）》，《组织工作》第1期，1951年10月1日。

[4] 戴茂林：《中共中央东北局1945—1954》，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6] 王振良：《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特别是在全国执政以来，尤其重视反腐倡廉建设，“三反”运动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初战，刘青山、张子善的案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一件影响力极大的贪腐案件，严惩刘青山、张子善，教育了党员干部，依法严惩了贪污腐败人员，维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1]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不仅贪污腐败的公职人员受到了严惩，也使官商勾结的不良社会现象暴露出来，牵扯出部分违法的工商业者，国家资产流失的问题受到了关注。为整顿经济发展中的不良之风，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全国大中城市开展“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运动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2]“五反”运动主要针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项私营工商业中常见的违法行为。

相比“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涉及范围更广，二者的指导策略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五反”运动发动和全面展开阶段，对于极少数最反动的资本家采取孤立和打击措施，大量揭露不法资本家严重违法的罪恶事实，由人民政府逮捕法办劣迹昭著的不法资本家。在

“五反”运动进入高潮后，党中央及时指示各大城市在开展斗争的过程中，应保证合法合规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其中，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中特别提到，对于守法工商户要鼓励照常营业，尤其要求天津“五反”斗争工作必须于2月之内完成。

“五反”运动执行了中央规定的合理从宽政策和分类处理原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做法，并允许资本家申诉和进行复查，定案工作稳妥完成，不但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民主改革的进程，而且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调动了经营积极性，维持了工人和店员的就业，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共同纲领》轨道上继续发挥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3]1952年6月5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宣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4]

四、反腐倡廉制度的早期奠基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奠基期，当时党和政府在注重群众运动反腐的同时，努力探索反腐制度建设，初步建立起包括党纪法规在内的一系列反腐倡廉基本制度。^[5]

一是使反腐运动有法可依。在指导“三反”“五反”工作时，毛泽东强调，严格执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开国领袖画传系列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166页。

[4]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大事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5] 王传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制度建设论析》，《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第39—48页。

法、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严禁逼供。^[1] 1954 年宪法修订对于《共同纲领》中关于反腐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成为指导我国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的根本制度。

二是同步推进制度建设。1952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强调制度建设，提出通过制度建设“改进‘三反’运动中的工作缺点，以便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指出民主制度是制度建设的中心，定期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2]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腐制度建设方面，天津市委、天津地委从区域反腐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巩固反腐成果做出一定贡献。为了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长期贯彻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天津市和天津专区的“三反”运动并非以查清反腐案件而结束，而是充分巩固运动成果，积极开展相关制度建设。一方面，加强党员干部政治学习和教育工作，严格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上的界限。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探索和形成了一套切实有效的机关民主制度，包括党员干部的组织生活制度、工作制度、日常生活制度、干部管理制度、机关财务制度、学习制度、保密制度等。这些基于地方基层管理实际的制度总结十分细致，如文安县（1949 年 8 月 1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保定成立，天津专区为河北省人民政府辖区，辖文安县等

10 县 3 镇）规定：每日两小时的理论、政治、文化学习时间，工作时间不准各房间乱窜，日常生活衣服要经常洗晒等。^[3]

总的来说，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改变，党所肩负的任务从过去领导武装斗争掌握局部政权到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领导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以及党员的素质都亟待提高。^[4] 经过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等整顿和发展，无论是党员素质，还是社会风气，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同时，党中央十分重视阶段性整顿成果的巩固，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反腐法律法规和制度。从天津地方的反腐成果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斗争取得实效，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和细化。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廉政建设，不但教育了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而且有力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促进了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等新社会风气的形成。也正是延续了这样的优良传统，建党百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发展和完善，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持续增强，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保驾护航。^[5]

（作者单位：滨海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服务中心、市档案馆规划部）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809 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27 页。

[3] 中共文安县委：《“三反”运动材料》，1952 年 1 月—7 月，河北省廊坊市档案馆藏，1-1-108。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72 页。

[5] 《新中国“反腐第一刀”——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当代党员》，2021 年第 13 期，第 31—34 页。

红 色 记 忆

——平津战役纪念馆里的廉政故事

祁雅楠

百年党史，既是党的探索史、奋斗史，也是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史。廉政教育是所有党员干部不可缺少的一堂政治课，廉政意识是党员干部时刻牢记心中的一道思想防线。让我们一起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从毛泽东的一双粗布鞋、朱德的皮箱和任弼时的围巾了解一代伟人廉洁自律的故事。

1948年的春天，当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来到西柏坡这个小山村的时候，他们和所有的干部一样，只有一身灰布棉制服。然而，就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和指挥了震撼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毛泽东的一双粗布鞋

到过平津战役纪念馆的观众一定还会记得，在战役实施厅的展柜里陈列着这样一张黑白照片：一座普通的北方土屋前，一代伟人毛泽东脚穿一双旧粗布鞋，神采奕奕满脸微笑地坐在一把帆布躺椅上，躺椅的旁边放着一双崭新的布鞋。这是一张普通的照片，但每一位参观者都会在这张照片前驻足凝视，他们眼中充满敬意和渴望，从这张照片中看到了伟人的风采，感悟到了历史的厚重。

1948年5月，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转战陕

北的艰苦行军，终于来到了西柏坡，虽然这里的条件比起陕北明显好了许多，可是毛泽东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衣服穿破了不愿换，鞋子穿坏了不愿扔，生活和工作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他的“恋旧”情结都是深有体会的，可这次毛泽东女儿的保姆——韩桂馨看到主席脚上穿的这双粗布鞋，实在是旧得不能再穿了，就抓紧时间赶做了一双新布鞋，想找个机会让主席换上。恰好这天，毛泽东同志批阅完文件，到院子里散步并坐在躺椅上休息。韩桂馨看到后赶紧把准备好的新布鞋拿到主席身边，劝主席把旧布鞋换掉，可不管韩桂馨怎么劝，主席只是说：还能穿。并意味深长地说：“小韩阿姨啊，艰苦朴素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我不带头怎么教育别人呢？”^[1]于是新鞋子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放在了躺椅的旁边。这一幕被城工部的秘书张小鹏看了个满眼，于是他激动地拿起相机拍下了这张感人而永恒的照片。

提起毛泽东同志的简朴生活，可远不止这双布鞋的故事，说起来也许大家不信，身居要职的毛泽东同志擦脚、擦脸只用一块毛巾，当时卫士长曾劝他再买条新毛巾，把擦脸和擦脚的毛巾分开，主席风趣地说：“不要分开了，现在整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分开就不平等了，脚会有意见的。”卫士长开玩笑地说：“要

[1] 陈卫平、虞晓芹、刘文韬：《毛泽东同志的“严实”作风》，《湖南日报》，2015年5月26日，第7版。

不就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主席轻轻摇摇头：“账可不能这么算，我多用一条毛巾可能浪费不到哪去，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的钱，我看能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1]

转眼间冬天到了，战士们早早就穿上了新棉衣，可主席身上穿的却依然是那件陪伴了他四年的旧棉袄。两只袖口已经露出了棉花，胳膊上也是补丁摞着补丁，大家都劝他换件新的，但主席却说前线每天都在打仗，战士们比我更需要衣服，新衣服应该留给他们穿。

这就是我们领导了中国革命的领袖，一位指挥了百万大军的革命统帅，他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不曾改变，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仍然用着打了73块补丁的毛巾被。这就是革命领袖的本色。

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毛泽东同志一生朴素节俭，严格要求自己，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一种精神，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一种艰苦朴素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思想宝库的瑰宝，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更加散发出璀璨的光彩。

朱德的皮箱

平津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只棕色的皮箱，虽然已经磨破了边，褪去了色，但很多观众都会驻足凝视，因为这只皮箱的主人就是朱德元帅，上面每一处磨痕都是革命硝烟的印记。

1886年12月1日，朱德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作为佃农的儿子，苦难使他能够更加强烈地理解他人的痛苦，并转化为强大的革命热情，决心要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1909年初，他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之后参加辛亥革命、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护法战争，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尽管拥有了高官厚禄、大好前程，但第二年他毅然放弃一切，决心走上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道路。他辗转上海、德国，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只皮箱跟随朱德元帅南征北战，里面装的是他的衣物、书籍、办公用品。从延安到西柏坡，革命形势逐渐明朗。西柏坡作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指挥所”，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三大战役”在这里指挥，收官之战平津战役的胜利更是为新中国定都北平献上厚厚的奠基礼。

1949年3月23日，朱德元帅怀着激动的心情带上旧皮箱，随部队踏上新征程，“进京赶考”成功了。旧皮箱见证了他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无限喜悦，见证了他无私忘我、一心为民的宽广胸怀，见证了他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里不变的初心使命。

女儿朱敏将去苏联留学时，朱德元帅特意将这只皮箱送给女儿。集中营的苦役使朱敏落下终身病痛，后来孤独的流浪生活也让朱敏学会坚韧，这一次求学能够带上父亲的旧皮箱，其实也时刻提醒朱敏，她拥有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父爱的温暖将一直伴随简单质朴的行程。在苏联好好学习，学成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这是父亲的谆谆教诲。朱敏一直牢记，回国之后兢兢业业地工作，简单低调地生活，每次摩挲着皮箱，就想起父亲将个人付诸时代，将全部奉献国家的伟岸灵魂，感受到无限的前行动力。1996年11月，她将皮箱捐赠给平津战役纪念馆，希望这笔精神财富能被更多的人铭记。

[1] 陈卫平、虞晓芹、刘文韬：《毛泽东同志的“严实”作风》，《湖南日报》，2015年5月26日，第7版。

皮箱不仅仅是历史的忠实见证，也承载了朱德元帅对革命始终如一的忠诚、对女儿感人至深的关怀、对国家无私奉献的大爱。皮箱虽然旧了磨了，但依然不妨碍它长存于精神宝库，展示着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榜样风采，激励着我们坚守优良传统、开创美好未来！

任弼时的围巾

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的一条围巾总是能让观众感慨惊叹，没想到中央领导的围巾竟如此朴实无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劳碌一生却不舍得给自己添置衣物的父亲形象。这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任弼时在苏联购买的围巾，在1996年平津战役纪念馆筹备建馆期间，由其女儿任远志捐赠给平津战役纪念馆。接过这件珍贵的文物时，细心的工作人员被领导的简朴感动了，这条蓝底格纹的围巾上竟有大大小小17个洞，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

在任弼时30年的革命生涯中，多数时间担负要职，但他从不以权谋私，始终廉洁自律。他以“三怕”著称：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1]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任弼时拖着病重的身体坚持出席，这让青年朋友们十分感动。任弼时读了报告的上半段就已经没有力气了，不得已将报告交给别的同志代为读完。^[2]

任弼时同志身体不好，一个原因就是被捕入狱时遭受刑讯落下了病根。1929年11月7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不幸被捕。敌人因为什么都问不出来，搜身检查也只找到了一张电车“派司”，无从证明任弼时的身份，

气急败坏之下数次电击任弼时，在他的背上烙出拳头大小的两个窟窿。任弼时在被拘留的40多天时间里硬是凭借坚韧的意志挺过来，从未出卖组织，出狱后最严重的两处伤口已经化脓溃烂。此后多年，他又不知疲倦地工作，积劳成疾。即便这样，他依然拖着病弱的身体带领部队长征，扶杖而行，从未掉队，还把自己的马让出来运送伤员，跨越赣、湘、桂、黔、滇、康、川、青、甘等地，可以说创造了以极度虚弱的身体挑战险恶环境的奇迹。

正是有了艰难困苦的淬炼，任弼时不忘本色，生活上坚持一切从简。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参加入城阅兵式，任弼时不同意：“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3]

围巾破了照样戴，毛衣破了照样穿，就连被子褥子也是老家当。老家来的亲人看望任弼时，都惊讶万分，没想到首长的生活如此简朴：大人的衣服是破的，孩子们的衣裤上都是补丁。

任弼时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谈论自己的功劳地位和权力。当孩子们问起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总是回答：“我干一般工作，坐办公室。”他对子女的教导也彰显了胸怀和格局，在他的影响下，“吃了人民的小米，就为人民做事”成为子女坚定的信念。子女们长大后都从事技术工作，为社会发展竭尽所能。^[4]

一条围巾，见证了任弼时的质朴本色，承载着他的家风故事，也是我们宝贵的红色财富，值得我们代代传承。

（作者单位：平津战役纪念馆）

[1] 劳骥：《任弼时“三怕”》，《前线》，2014年，(06)。

[2] 秦云：《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历史教学》，1964年，(06)。

[3][4] 朱薇：《“党和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学习时报》，2017年4月17日A5版。

天津市旧志整理浅析

刘 蒙

中国现存旧志 8500 余种，约 10 万卷，其中蕴含着不同时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信息，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做好旧志整理工作，对落实好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传承好天津历史文脉，服务好天津经济发展，发挥好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旧志整理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等职责；2021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会议提出“深入开展地方史编写工作以及旧志、谱牒等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的要求。同时，天津市档案馆在《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中也把影印出版《天津历代方志集成》列为重要任务。因此，天津市抢抓机遇，重启旧志整理工作，完成地方志机构应尽职责，具有深远意义。

（一）紧跟形势，顺势而为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决策部署，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指示精神，完成全市地方志工作整体布局，加大旧志整理工作力度，打造天津文化品牌，力争成为宣传天津文化的名片。

（二）填补空白，扩大影响

与广东、河南、山东等地相比，天津市还

没有一套权威的旧志集成，这与直辖市的地位不相匹配。开展此项工作，可以填补本市地方志工作空白，深入挖掘天津历史资源，更好宣传天津文化，服务天津经济社会发展。

（三）开发利用，服务群众

开展旧志整理工作，出版一套天津市旧志集成，可以更好为人民群众服务，方便人民群众查阅资料，也可将其作为文化成果，与相关部门交换，丰富与全国兄弟省市文化交流的形式，扩大天津地方志影响，助推工作提质增效。

二、天津市旧志整理情况

当前，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将旧志整理工作作为重点任务，着力将其打造为当地文化品牌，宣传地方文化的名片。广东、河南、山东、上海、重庆、四川等省（市）先后以影印、点校、翻译、数字化等形式，完成了旧志整理出版，为天津市开展旧志整理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一）天津市已整理旧志情况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先后完成《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和《天津市区县旧志点校》出版工作。

《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由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整理，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三册，共 500 余万字，收入旧志 12 部。上册于 1999 年 10 月出版，收入（康熙）《天津卫志》、（乾隆）《天津府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3 部旧志。中、

下册于2001年6月出版,收入(乾隆)《天津县志》、(同治)《续修天津县志》、(民国)《天津县新志》、(民国)《天津政俗沿革记》、(道光)《津门保甲图说》、(民国)《天津志略》《杨柳青小志》《说磬》《志余随笔》9部旧志。2002年获得天津市第三届优秀志书(类)特等奖。

《天津市区县旧志点校》由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和武清、静海、宝坻、宁河、蓟县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共同编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共三册,400余万字。收入(乾隆)《武清县志》、(嘉靖)《静海县志》、(同治)《静海县志》、(民国)《静海县志》、(康熙)《宝坻县志》、(民国)《宝坻县志》、(光绪)《宁河县志》、(嘉靖)《蓟州志》、(道光)《蓟州志》、(民国)《蓟县志》10部旧志。

至此,天津市地方志办共点校整理旧志22部。2008年以后,旧志整理工作予以搁置。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市地方志办将主要精力放在完成“两全目标”上,旧志整理工作尚未及时开展。

此外,天津图书馆于建卫600年之际,曾对一批馆藏古籍进行了影印,其中包括部分旧志,但未公开出版。

(二) 天津旧志存藏情况

为摸清天津市旧志存藏情况,年鉴指导部在查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新编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方志集成天津府县志辑》等工具书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线索,将全市分为三个层级进行了考察摸底。据了解,天津历史上共有旧志70部,现存旧志48部,佚志22部,现存旧志有关信息见《天津市旧志存藏情况汇总表》。

1.市档案馆馆藏情况。市档案馆资料库保存旧志7部,分别为(民国)《天津县新志》、(乾隆)《武清县志》、(康熙)《宝坻县志》、(乾隆)《宝坻县志》、(道光)《蓟州志》、(民国)《重修蓟县志》、(民国)《天津县新志人物艺文单行本》。市地方志馆保存旧志10部,分别为(康熙)《天津卫志》、(乾隆)《天津县志》、(同治)《续天津县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民国)《天津市概要》、(民国)《新校天津卫志》、(乾隆)《宝坻县志》、(民国)《天津县新志人物艺文单行本》、(民国)《天津县新志》、(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

2.各区存藏情况。南开区地方志办保存旧志1部,(民国)《天津县新志》;武清区地方志办保存旧志1部,(乾隆)《武清县志》,据悉,武清民间藏有2部旧志,(康熙)《武清县志》、(光绪)《武清县志》;宁河区地方志办保存旧志2部,(乾隆)《宁河县志》、(光绪)《宁河县志》;静海区地方志办保存旧志2部,(同治)《重辑静海县志》、(民国)《静海县志》;宝坻区地方志办保存旧志1部,(乾隆)《宝坻县志》;蓟州区地方志办保存旧志和文献5部,分别为(嘉靖)《蓟州志》、(康熙)《蓟州志》、(道光)《蓟州志》、(民国)《重修蓟县志》、(同治)《盘山志》。

3.各相关单位存藏情况。从《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珍贵馆藏图书目录》中梳理出市社科院图书馆保存旧志书目12部;天津图书馆保存天津旧志32部;南开大学图书馆存藏天津旧志24部;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存藏天津旧志12部;国家图书馆存藏旧志19部;首都图书馆存藏旧志13部,另有一部《津海道概况》尚未确定是否为旧志。

上述数据来源于笔者对相关资料的查阅、天津市相关单位的实地查看以及外省市相关单位

天津市旧志存藏情况汇总表

序号	分类	志书名称	基本信息	天津图书馆 (32)	市社科院图书馆 (12)	市档案馆 (7)	市地方志馆 (10)	南开大学图书馆 (24)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12)	国家图书馆 (19)	首都图书馆 (13)	各区 (14)	
1	天津市	(康熙) 《天津卫志》	薛柱斗纂修,四卷,首一卷。1934年题名《新校天津卫志》	存			存	存		存			
2		(乾隆) 《天津府志》	李梅宾、程凤文修,吴廷华、汪沆纂,四十卷	存				存		存			
3		(乾隆) 《天津县志》	朱奎扬、张志奇修,吴廷华、汪沆纂,二十四卷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4		(同治) 《续天津县志》	吴惠元修,蒋玉虹、俞樾纂,二十卷,首一卷,嘉庆末年修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5		(光绪) 《重修天津府志》	沈家本、荣铨等修,徐宗亮、蔡启盛纂,五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6			《新校天津卫志》	1934年民国重新题名,加校注	存			存	存	存	存		
7		(民国) 《津门精华实录》	中华舆图学社编,不分卷	存	存								
8		(民国) 《天津县新志》	高凌雯纂,十一卷,首一卷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9		(民国) 《天津志略》	宋蕴璞编,二十编	存	存							存	
10		(民国) 《天津市概要》	天津市志编纂处编辑,十三编,首一编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11		(民国) 《天津政俗沿革记》	王守恂纂,六卷	存	存			存	存				
12	武清	(康熙) 《武清县志》	邓钦楨修、耿锡胤纂,十卷,存残本,有康熙十四年(1675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一、三、十卷,上海图书馆藏微缩胶卷									存	

序号	分类	志书名称	基本信息	天津图书馆 (32)	市社科院图书馆 (12)	市档案馆 (7)	市地方志馆 (10)	南开大学图书馆 (24)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12)	国家图书馆 (19)	首都图书馆 (13)	各区 (14)	
13	武清	(乾隆) 《武清县志》	吴翀修,曹涵、赵晃纂,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存	存	存				存		存	
14		(光绪) 《武清县志》	蔡寿臻修、钱锡霖纂,十卷,首一卷,末一卷。稿本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抄本藏国家图书馆									存	
15		(光绪) 《武清志括》	蔡寿臻辑,六卷,有抄本,仅藏国家图书馆							存			
16		(民国) 《武清县事情》	陈佩编,一册,图一幅	存									
17	宝坻	(康熙) 《宝坻县志》	牛一象修、苑育蕃纂,八卷	存		存							
18		(乾隆) 《宝坻县志》	洪肇楸修,十八卷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19	蓟州	(嘉靖) 《蓟州志》	熊相纂修,十八卷,刻本,存残本,有嘉靖三年(1524)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一至十四卷,又藏微缩胶卷;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微缩胶卷;宁波天一阁藏第一至四卷									存	
20		(康熙) 《蓟州志》	董廷恩纂修,八卷,抄本,存残卷,国家图书馆藏第一至五卷,上海图书馆藏微缩胶卷										
21		(康熙) 《蓟州志》	张朝琮修、鄂棠等纂,八卷	存									存
22		(道光) 《蓟州志》	沈锐修,章过、金天瑞纂,十卷,首一卷	存		存					存	存	存
23		(民国) 《重修蓟县志》	徐葆莹、李午阶修,仇锡廷纂,十卷,首一卷			存			存		存		存

序号	分类	志书名称	基本信息	天津图书馆 (32)	市社科院图书馆 (12)	市档案馆 (7)	市地方志馆 (10)	南开大学图书馆 (24)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12)	国家图书馆 (19)	首都图书馆 (13)	各区 (14)
24	静海	(康熙) 《静海县志》	阎甲胤修、马方伸纂,四卷	存						存		
25		(同治) 《重辑静海县志》	郑士蕙纂修,八卷	存				存		存		存
26		(民国) 《静海县志》	白凤文修、高毓澎纂,十二集	存				存	存	存	存	存
27	宁河	(乾隆) 《宁河县志》	关廷牧修、徐以观纂,十六卷	存				存			存	存
28		(光绪) 《宁河县志》	丁符九修、谈松林纂,十六卷	存				存	存	存		存
29	杨柳青	(民国)《天津杨柳青小志》	张江裁编,一卷	存								
30	人物志	(民国) 《天津县新志人物艺文单行本》	高凌雯纂,六卷	存	存	存	存					
31		(民国) 《敬乡笔述》	徐士銮辑,六卷	存				存		存	存	
32	风土志	(光绪) 《津门杂记》	张熹辑,上中下三卷	存	存				存	存	存	
33		(光绪) 《津门纪略》	羊城旧客辑,十二卷	存								
34	祠堂志	(光绪)《天津淮军昭忠祠录》	辑者不详,不分卷,现有影印本,收入《中国祠堂志丛刊》,广陵书社2004年版									
35	游览志	(民国) 《天津游览志》	张江裁编,一册238页,有照片附《皇会考》	存							存	
36	乡土志	(光绪)《宁河县乡土志》	周登皞编,不分卷	存								
37	山志	(康熙) 《盘山志》	智朴编,朱彝尊、王士禛校注,十卷,补遗五卷					存				
38		(乾隆) 《钦定盘山志》	蒋溥、汪由敦、董邦达修,二十一卷					存				
39		(同治)《盘山志》	根据康熙版补刻					存				存

序号	分类	志书名称	基本信息	天津图书馆 (32)	市社科院图书馆 (12)	市档案馆 (7)	市地方志馆 (10)	南开大学图书馆 (24)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12)	国家图书馆 (19)	首都图书馆 (13)	各区 (14)
40	山志	(民国) 《说磬》	周崧年辑,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收藏									
41	长芦盐法志	(隆庆) 《长芦盐法志》	方启参撰,七卷,存三残卷,有隆庆三年(1569)刻本,宁波天一阁收藏									
42		(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	鲁之裕编纂,十六卷	存			存	存				
43		(乾隆) 《长芦盐法志》	徵瑞纂,沈延年绘图,十八卷					存				
44		(嘉庆) 《长芦盐法志》	黄掌纶等纂,二十卷、附编十卷					存				
45		(民国) 《长芦盐法志》	吕懋光著,二十六卷,存,有稿本,河北省档案馆收藏									
46	杂志	(民国) 《志余随笔》	高凌雯著	存	存			存	存			
47	图册	(道光) 《津门保甲图说》	道光二十六年(1846)	存				存				
48		(光绪)《武清县城乡总册》	蔡寿臻纂修							存		

备注: 1.《新校天津卫志》为(康熙)《天津卫志》1934年提名重印版本; 2.(同治)《盘山志》为根据(康熙)《盘山志》补刻版本; 3.北京图书馆存有《津海道概况》一书,尚未确定是否属于志书。

的调查,如有出入,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进行指正。

三、天津旧志整理及存藏的一些问题

经过对天津市旧志的了解及实地查看,结合其他省市旧志整理工作的先进经验,当前旧志整理及存藏均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 存藏分散,情况复杂

天津旧志的存藏单位中,既有档案馆、图书馆、各高校、有关单位,还有民间私人收藏以及其他省市收藏,情况十分复杂,给旧志整理工作带来很大阻力。截至目前,很多

旧志也只掌握存藏信息,并未实地查看情况。另外,存藏旧志较多的单位,如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其存藏种类都高度集中,也带来了很多工作的重复性和复杂性。

(二) 整理方式较为单一

旧志整理的方式多种多样,许多方志专家也多次将旧志整理具体内容进行总结,浙江大学鲍永军教授曾在《旧志整理述论》(《中国地方志》2015年10期)一文中将旧志整理工作

总结为9个方面：资源普查；编制目录；编辑提要；编制索引；影印出版；校勘、标点、注释、翻译；辑佚；编辑出版专题资料汇编；数字化建设。根据中指办对全国旧志整理的的数据，大多数省市县仅做了影印、点校、繁化简几项工作，形式单一，难以满足大众需求。

（三）专业人才出现断层

旧志整理的关键在于质量，影响旧志整理质量的关键在于人才。20世纪末，第一轮修志完成后，伴随着丰硕的成果，各地涌现一大批修志人才，对旧志也有深刻的理解，是整理旧志的最好时机，天津市地方志办两次对旧志的整理也出现在那个时候，然而这两次点校仅立足于现有旧志，未对天津旧志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清点整理。第二轮修志人员多为新手，且较少接触与使用旧志，为旧志整理工作增加许多困难。

（四）缺少旧志整理规范及标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兴起一轮旧志整理热潮，中指组也制定了《中国旧方志整理规划实施方案》，之后再未出台其他相关标准规范。因年代久远，我们未查找到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同时，天津虽然经历两次旧志整理，但未制定相关规范，旧志整理没有可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四、天津旧志整理的几点思考

旧志整理工作任重道远，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如何做好旧志整理工作，还需要不断思考与探索。

（一）继续摸清底数

目前，天津市现存的48部旧志中，还有6部至今未看到实体志书。（康熙）《武清县志》、（光绪）《武清县志》由武清民间收藏，一直通过武清区地方志办进行联系沟通；（民国）《说磬》有点校本；（光绪）《天津淮军昭忠祠

录》只有影印版收入《中国祠墓志丛刊》；（隆庆）《长芦盐法志》仅藏于宁波天一阁；（民国）《长芦盐法志》藏于河北省档案馆，均未看到实体书。要继续与相关单位联系，摸清旧志存藏底数，为做好旧志整理工作夯实基础。

（二）组建专家队伍研究论证

旧志整理最重要的是解决“整什么”和“怎么整”的问题。各单位所藏天津旧志版本不一，原刻本、刻本、抄本、影印本等均有出现，选择哪个版本作为基础、整理结果以什么形式呈现、如何统一整理标准等均需借助专家力量。拟从馆专家库挑选数名热爱旧志，对旧志有一定研究的地方志专家，组建天津旧志整理专家组，全程参与旧志整理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此项工作。

（三）制定旧志整理标准规范

旧志整理不是一蹴而就，也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为确保旧志整理高质量持续推进，当务之急是制定天津市旧志整理实施规范。起草旧志整理出版实施规范，组织专家商讨，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对旧志整理工作的整理、统稿、评审、出版各环节进行规范。

（四）加强地方志人才培养

缺少专业人士一直是困扰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借助此次旧志整理契机，吸纳一部分地方志新人加入，以干代培，不仅能够为旧志注入“新血”，更为今后天津地方志事业发展注入蓬勃生机。

旧志整理工作是新时代地方志机构一项重要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二轮修志结束、三轮修志尚未正式启动的间隙，适时启动旧志整理工作，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各环节工作，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旧志整理工作。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年鉴指导部）

燃烧自己 照亮航程

——评《天津市志·北海航海保障志》的编修特点

赵继华

《天津市志·北海航海保障志（1840—2012）》（简称《北海航保志》）是在天津市二轮修志期间编纂完成的一部专业志书，于2020年11月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笔者收到这部装帧精美、印制精良的鸿篇巨制，并认真拜读了洋洋洒洒200余万言的志文，深深感受到了“航保人”对记述信史的责任和担当，也体会到了书稿的字里行间凝聚了编纂者多少的心血和汗水！他们用“燃烧自己，照亮航程”的坚定理念，完美书写了“航保人”为祖国的航海事业快速发展、兴旺发达而无私奉献的绚丽篇章！

《北海航保志》是全国首部融合航标、测绘、通信三项业务为一体的航海保障专业志书。全书正文设置10章48节247目，结构设置科学合理，文字记述简洁流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很好地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是一部整体质量水平较高的专业志书。

这部志书的编纂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述体”结构完整、书写精当，是本志的显著特点

《北海航保志》“述体”设置非常完整规范，除了志前的“综述”外，还在各个章、大

部分节、甚至于有的目前设置了“无题小序”，极大地增强了志书的整体性效果，成就了一部具有较高学术含量和著述水平的专业志书。

我们知道，“概述（本志为‘综述’）是当代新编志书的创新体裁形式，又是一部志书中最讲究概括能力、最讲究思想深度、最讲究文字技巧部分。”^[1]

本志的“综述”，采用史纲体记述，总计1.5万余言。“综述”的前言先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航海安全对于水上安全技术发展的依赖关系和北海航海安全机构的职责与在航海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综述”主体内容按照历史时期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新石器时代记起，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迄于清代，记述了人类航海活动由刳木为舟、逐岛漂流，到元明时期随着海上漕运的兴起、郑和七下西洋“将古代中国远洋船队规模及航海保障技术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顶峰，为开启全球大航海时代铺平了东方航路”。

第二部分从晚晴时期记起，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威吓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

[1]《当代志书编纂教程》第十二章志书其他内容的编写，第二节概述的撰写，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501页。

国不平等条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随之天津、烟台、营口等地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津海关、东海关、牛庄海关等相继设立；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国力大衰，西方列强割地殖民行径渐成狂潮，中国沿海重要港湾被瓜分殆尽，青岛、大连、威海等口岸相继沦为殖民地，直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8年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时，北方海区……留下一个支离破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第三部分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记起，“中央人民政府废除外籍税务司制度等陈规旧法，取消西方列强霸占的港航管理特权，接管改造国民党官僚机构，开元更新，重整河山”。此后，经历了各级航海保障机构称谓及隶属关系数次变更和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航海保障事业的发展，直到1977年改革开放前夕，北海航海保障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第四部分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记起，至本志的下限2012年，是为记述分量最重的一个时期。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家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列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航运经济空前繁荣，港口建设日新月异，航海保障事业随之兴旺”。其间，经历了航海保障事业管理格局的变更和建制体制的改革、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部门规章、行业标准的陆续公布施行，航海保障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和一系列科技成果，承担了一系列重大事故搜救抢险工作，“航保人”为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为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综述”中

记述了“航保人”研发的一系列科技成果，其中不乏获得省部级奖项和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证书等。看了这段记述，由衷的敬佩“航保人”的聪明才智和敬业奉献精神，以及他们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在以上四部分内容的记述中，始终贯穿一条主线，即人类航海活动、航海与航海保障技术以及保障能力发展变化、兴衰起伏的历史进程。不管是航标业务的保障能力，还是测绘手段的发展水平，抑或是电信科技的现代化程度，均与国家的主权地位、经济发展状况及科技水平提高的大背景紧密相连，记述脉络清晰、层次分明、阐述深刻、论述精当，充分发挥了史纲体的记述优势，是一篇非常成功的综述。

例如，在第二部分论述近代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作用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问题分析的客观、透彻，得出的结论让人信服，增强了志书“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

本书各章、节的无题序亦为本书添彩增益。各个章和节的无题序是“述体”的第二、三个层次，撰写的方法与“综述”基本一致，都做到了“高屋建瓴，提纲挈领，钩玄提要，夹叙夹议，画龙点睛，不同的是概括篇章节的资料面不同”。^[1]《北海航保志》的无题序在写法上能够视需要灵活的运用多种文体，以加强记述深度、提高可读性。例如，在每篇无题序开头先用一段“释义性”文字，对本章或节的记述对象进行必要的阐释，加深读者对记述内容的理解。第三章航标业务的无题序，第一个自然段仅用了100余字即对航标的定义、航标的种类、航标的作用、航标的特征以及运用的领域做出了言简意赅的说明。全志每篇无题序的主

[1]王晖：《论方志概述与小序》，《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7期。

体内容，一般用纪事本末体予以记述，做到了提挈重点突出，钩点历史清晰，与记述正文相呼应，起到了提纲挈领、钩玄提要的作用，为记述文体增色不少。

笔者在一轮修志时曾撰文将新编综合性地方志书“述体”结构归纳为三个层次，“一是全志的概述（或称总述、综述）；二是各专业志（篇、章）的无题序（或称简述、简况）；三是各章、节之下的无题小序。这三个层次在志书中各有所用：全书的概述（或综述）具有统摄全书的作用，有人将它的功用归纳为总括地情、沟通联系、彰明因果、提炼精华、策论方略。各专志（篇、章）的简述则侧重于叙述该专业或事项的起始与兴衰历程、行业特点和发展轨迹。各章（节）的无题小序，则采取灵活多样的写作方法，或简述历史，或提要内容，或说明范围，或介绍背景，或交代体例，主要起导读作用。”现在看来，一些志稿对述体的设置并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写与不写、在哪个层次写，随意性较大，使志书的出版质量，特别是著述水平受到影响。能像《北海航保志》这样设置三个层次的述体结构实属不易，在撰写中也下足了功夫，做到了概要精当、论述深刻、笔触凝练、词句优美，无论是综述还是各章节的无题序，都写成了一篇篇难得的上乘佳作。

二、图体和表体得到充分合理运用，有效增强了志书的资料含量

（一）有关图体运用

图体是志书重要体裁之一，“它形象直观地反映志书所规定的内容，其功能不是文字所能替代的”。^[1]《北海航保志》中图体的运用十

分广泛，包括专题地图、各类示意图和各类照片等近 800 幅；尽管数量较多，但这些图照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或认真挑选，使每幅图照都有其存史和资料价值。

例如示意图，涉及航海保障机构和各项业务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机构设置示意图、航标灯机（器）示意图、基站布局示意图、扫海具扫海示意图、仪器工作原理示意图、海岸电台遇险通信处置流程图、T 型天线示意图、海测水文站分布示意图、国际组织标识图等。可归纳为以下 3 个方面特点：

一是集中设置，整齐划一。根据北方海区海域广阔（是为山东省和江苏省交界处以北的黄海、渤海海域），航海保障机构设置历史悠久（始于清咸丰十一年，清政府相继在天津、登州、牛庄设立海关监督衙门和海关税务司署），管理机构变更频繁、业务部门众多、隶属关系复杂多变等特点，采取随文设置示意图的方式，以最简洁的版面，达到最简明的表述效果。在第一章机构沿革中，仅机构设置示意图就绘制了 50 余幅，这些示意图随着记述文字插入，制作简明、含义清晰，不同时期航海保障主管机关和基层单位的隶属关系、机构名称以及下属单位一目了然。既减少了大段文字的叙述，又增加了版面的美感。

二是突出专业特点，提升入志资料的科技含量。一些示意图绘制时，标明设施或设备的内部结构、技术指标等，加深读者对被记述事物的认知，有效提升入志资料的技术含量。例如，在第三章航标业务中有一张“1985 年研制的天津港活节式灯桩”照片，在照片旁有两张该灯桩的结构设计图，对灯桩内部结构标示的

[1] 《当代志书编纂教程》第三章方志的体裁，第五节图体，方志出版社，2010 年，第 58 页。

十分详细，使读者不仅通过照片清晰地看到灯桩的外形，还能够通过设计图进一步了解到其内部的结构，科学技术含量和资料价值通过示意图得到增强。

三是注重选材，视需要选择最佳反映方式。在第三章航标业务中，根据需要绘制了几张专题地图，突出显示出航标业务的专业性特点：其中，在“青岛奥帆赛航标保障”条目中，绘制了“2008年青岛奥帆赛水域航标配布示意图”，准确标示出5个赛区的水域位置；在“无线电指向标系统”条目中，绘制了“20世纪80年代北方海区无线电指向标布局示意图”，标示出北方海区各个指向标站的位置。还有“20世纪80年代北方海区中程无线电导航系统台链分布示意图”“2012年北方海区AIS基站布局示意图”等，每张专题地图绘制简明清晰，所显示的要素突出、明了，体现出较高的专业性特点。

照片也是图体中重要形式。《北海航保志》中收入照片内容丰富，涵盖了人物活动照片、自然物照片、建筑物和其他实物照片、事故抢险救灾照片、作业现场照片以及文献影印件等。其中不乏珍贵的历史照片，具有较强的资料和存史价值。

（二）有关表体运用

表是志书中重要记述体裁之一，分为事类表（或称类目表）和数字统计表两类。《北海航保志》中以事类表居多，涉及内容广泛，在各个章节中均有设置。数字统计表数量相对较少，主要在第一章机构沿革、第三章航标业务、第五章通信业务中有一些使用。

笔者对《北海航保志》表体在全书中所占篇幅做了粗略统计，所有事类表和数字统计表

占整体版面的15%左右，应当说表体所占比重是适宜的，表体的设置做到了“全而不滥、精而不缺”。^[1]

《北海航保志》表格设计精准规范、所列事项视需要确定。每张表的表名要素完整，表文项目分类科学合理，立项严谨。每张表单列了“序号”，方便阅读观览。凡是志文难以记述的内容，通过表体完整记述，避免了文字“流水账”式记述或数字的罗列让人读着枯燥无味的尴尬，又保留了具有存史价值的资料。例如，在第七章科技与信息化工作中记述“科技成果”，随文后列了三张表：“1964—2015年北海航海保障系统荣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励一览表”“1990—2015年北海航海保障系统获得国家专利一览表”“2012—2015年北海航海保障系统取得软件著作权一览表”，每张表的事项中均列出了项目（专利、软件）名称、获奖等级（专利号、证书编号）、颁奖部门（专利权人、著作权人）、主要参与人员（发明人）等，唯有以列表的形式才能将记述事项依照时序清晰地反映出来，达到单纯用文字记述难以达到的效果。《北海航保志》运用表体将复杂的事项化繁为简，与文字记述互为补充，既广泛收入了有存史价值的资料，又增强了书稿的可读性。

三、勇于探索，追求创新，努力打造精品良志

《北海航保志》虽说是在二轮修志期间完成的一部专业志书，但它不是在前志基础上的重修或续修，甚至于在全国都还没有一部同类专业的志书，它的编纂工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修。既是创修，在体例的把握和语言表述等方面，在立足于对传统志书体式传承的同时，编纂者

[1] 赵继华：《合理设置表体，提升志书著述水平》，《北辰志语》，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299—302页。

发扬勇于探索、追求创新的精神，努力将新编志书打造成为更符合时代特征的精品良志。这种勇于探索、追求创新的精神在志书的篇目设置、记述方式、资料选取等方面均有体现。

首先，设立“精神文明”专章，这在专业志中比较罕见，是为《北海航保志》重要的创新性尝试。“精神文明”章记述内容十分充实，设立了三节十目，12万余言，将航海保障系统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的重点、特点和亮点得以充分展现。

从志文中可以看出，北海航海保障系统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重视开展以共产主义理想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教育，注重推动航海保障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认真践行并对外展示“燃烧自己，照亮航程”的奉献精神 and “忠于国家，奉献社会”的宗旨意识，在创建文明单位和先进个人活动中，在开展航海保障文化研究与传播工作中，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其中，有一批单位获得省部级先进集体，有一批个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省部级劳动模范，还有一批个人获得全国或省部级“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系统“金锚奖”及“立功奖章”等。此外，北海航海保障系统还有一些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和科技精英以及技术能手等，在“精神文明”章中均予以记述。

在“精神文明”章中设立“人物”一节，是本志的一大亮点，也是该志一种创新性处理方式。一般市、县、区级志书设置“人物”是以“人物传”为主体内容，其他再列入“人物简介”“人物表”等，这在省、市、县三级志书中是必须设置的内容。对于独立成书的专业志，则应当视情况来确定是否有必要设置“人物”专篇。如果设置，在遵守“生不立传”原

则的同时，还要掌握好两个方面的标准：一是传主的影响足够大，二是有公允的社会评价。这两点把握不好，就必然会影响到对人物的记述质量。《北海航保志》将人物置于“精神文明”中记述，设立“人物简介”“人物名录”两目，“人物简介”记述了20人，主要记述了他们为航海保障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没有涉及人物的生平和社会评价，这其实也是一种“以事系人”写法的有益尝试。实践证明，这样处理是恰当的，也是成功的。

其次，运用文体灵活多样，使记述事物更为生动、具有文采，增强志文的感染力和感召力，提升了志书的可读性。

在第三章航标业务第一节航标管理中，记述应急管理对海上重大交通事故或突发自然灾害的处置，记述了13例救援、抢险任务情况，每一例都写得生动、鲜活，其中在“抗击‘8·19’台风”任务中有一段记述，“‘险情就是命令，一定要抢在台风来临之前，撤下贵重的测量设备’，由贾万忠等4人组成的抢险队立即出发，他们手拉手径直奔向团岛灯塔。风越来越大，雨水、海水、沙粒、石子打在抢险队员的脸上，隐隐作痛。拆卸设备只能一个人拆卸，另一个人将其死死抱住，两个人拆下设备，共同死死抱住。设备安全了，人员安全了，惊险过去了，抢险任务圆满完成了”。如果认为志书只能用平实的语言记述，这段用了描写的文字显然有不合志体之嫌。但这里记述的是抢险救灾的事例，单纯的罗列数字资料或简单地用平实的文字叙述，是不能完整、生动的反映抢险救灾真实过程的。

在记述古代航标“金州龙王宫”一段使用了写景状物笔法：金州龙王宫，又称龙王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位于渤海金州湾东岸龙王庙，坐落在突兀的山头上，“……庙西山体陡

峭，崖高数丈。崖下曾是金州渔港，渔船云集，樯帆如画。置身龙王宫正殿西窗，金州湾海景尽收眼底，每当日落黄昏，宁静海面，暮霭纱笼，片片白帆在金黄色的落日余晖中从四面八方缓缓驶向渔港，迷茫动人的景象美不胜收……”“白天，立于山顶的龙王庙和高耸立的旗杆赫然醒目；夜晚，临海西窗的烛光，成为引导舟船归航的明灯。”

记述中适当运用总结式写法，有时也是十分必要的。在测绘业务的测绘管理中，记述了“大连‘5·7’空难搜救测绘”案例，天津海测大队从接到任务，经过14个昼夜出色完成了三项任务：一是搜寻飞机残骸，配合打捞工作；二是成功搜寻“黑匣子”；三是航道扫测，确保大连港迅速安全通航。在记述搜救测绘完整过程之后，用一段文字做出总结，其中写道：搜寻扫测工作“……做到应急反应快速，抢险部署周密，组织指挥有序，信息沟通及时，协调各方顺畅，后勤保障有力”。这段文字总结概括的十分精当，起到对事物加深记述的作用。

第三，对于占有的资料精心甄别，用科学的态度采用资料。

在“视觉航标”的“自然航标”中对“碣石”的记述，有关碣石的地理位置存在多种说法，迄今尚无定论。《北海航保志》记载了主要的三种说法：一是碣石“沦于海”说（始自郦道元《水经注》）；二是碣石为“石”而非“山”说；三是碣石山即为碣石说，“此说以《汉书·地理志》《明一统志》《永平府志》《昌黎县志》为考据，认定古碣石就是今河北昌黎县北的碣石山”“当代《辞海》《辞源》《中国名胜词典》等权威工具书大多采信此说”。《北海航保志》编纂者并没有简单地依照古籍和

当代权威工具书中的采信结果，就断然采用第三种说法，而是采取“多说并存”的方式，将三种主要说法予以记述，反映出编纂者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以上是笔者拜读《北海航保志》归纳出的几个方面的优长。总的来说，《北海航保志》的体例结构，横向看编排有序，讲究严密的逻辑关系，纵向看隶属得当、层次清晰、叙述流畅。各种体裁在整部志稿中得到了充分运用，成就了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专业特色的精品佳作。

既是评论，就一定要找出些不足，如果说《北海航保志》还有某些提升空间或是尚有一些可调整内容的话，笔者觉得有两点值得商榷：

一是记述人物在笔法上还可以再放开一些，既然是采用“以事系人”的写法，就可以将人物和事迹写得更为生动、鲜活，正像“梁启超……曾经对史笔的‘飞动’作了非常精彩的论述：‘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也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即要像电影一样活动自然，字字活跃纸上，并使人感动……”^[1]

二是在“航标灯器”的“非电气化灯机”中有一段记述：“纵观中国沿海、内河设置非电气化航标灯器的发端，与美国同期非电气化航标灯器相比较，总体发展水平基本同步，部分灯器尚有领先。”后面有一大段从元代延祐年间至清代宣统年间，中国与美国的比较资料，这些资料具有存史和资料价值，值得收入志书，但放在正文中记述似有“越界”记述之嫌，如作为随文附录会更好一些。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原年鉴处）

[1] 梅森：《莫把相对当绝对——论当代志书文体语言认知窄化的弊端》，《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10期。

浅谈北辰区部门志、专业志的编修

赵菁

精心做好部门志、专业志志稿修改工作是编修高质量高水平志书的重要一环，也是贯穿修志始末的长期工作。北辰区地方志工作始终坚持以质量为本，自2016年《北辰区志（1979—2009）》成功入选“中国志书精品工程”后，坚持出版北辰区地方志分志丛书，并于2016年启动了镇街志编修，2017年又启动了部门志、专业志的编修，从而形成了“上下同修、全面铺开”的良好修志氛围。从志稿质量上看，大部分部门志、专业志志稿在完成初稿基础上，经过复审、终审两轮补充修改，志稿质量已有一定提高，但从整体水平看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分纂的目标任务，下大气力提升志稿整体质量。

一、部门志、专业志志稿存在的主要问题

章节目录设置比较齐全，重点内容摆位不够。数据统计比较详尽，文字提示性说明不够。记述事物条理比较清楚，重点特色彰显不够。纵不断主线的把握较好，节点折点反映不够。记述事物的完整性较强，主次详略把握不够。资料占有比较丰富全面，入志标准把握不够。内容记述比较充分，章或节下无题序的著述性不够。

二、明确目标任务、提升整体质量

部门志、专业志志稿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反映改革开放进程及其成就，反映时代特色和社会风貌；记录发展历程中的巨变，叙写新旧文化的撞击与交融；贴近民计民生、贴近社会生活、贴近基层民众，修志最终要实现读志用志，力求服务社

会发展；资料性与著述性有机结合，点线面各有侧重综合记述；篇目突出部门特色，资料突出亮点重点，内容突出时代特征，记述突出节点要点，语言突显朴实简洁；记述时要站在一定的高度，统计、商业等经济部门的部门志、专业志记述要有深度，民政、红十字会等社会部门的部门志、专业志记述要有广度，档案馆、文旅局等文化类部门的部门志、专业志记述要有高度，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司法行政类部门的部门志、专业志记述要有亮点和鲜明特征。

三、严格把握部门志、专业志入志资料

1. 工作计划不书，标准要求慎入

每季度或每年各科室的工作计划不入志，行业内的标准及要求也不要入志。例如《民政志》复审稿第三章基层自治组织第三节第三目关于对村委会成员待遇的规定写得过多过细，修改志稿时应一并删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志》复审稿第十章中规划、方案、决定、要求的内容入志较多，修改时建议删除该部分内容。

2. 专业性释义不书，通典性概念慎入

专业性的解释和行业内通典性的概念均不入志。例如《财政志》复审稿第三章关于财政收入记述：“财政收入是指国家采取适当形式，把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为社会创造一定的社会产品价值纳入国库，从而形成国家的集中财力。”第四章关于财政支出记述：“财政支出是国家为执行其职能，按照国家预算所支付的各项支出，是财政活动的重要方面。财政支出既

体现财政支出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作用，也是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两条均为专业性释义，后期修改要删除。《供销社志》复审稿第十一章第二节中“增值税税率表”，是国家税收政策，属通典，不应入志，修改时建议删除。

3.一般推动性工作不书，具体过程慎入

一般性的推动工作不入志，工作过程要少记或者不记，只需如实记述工作结果。部门志的志书复审稿多处记述召开会议情况，记述内容过细，包括在哪里召开、谁参加、谁主持会议、谁讲话、讲话内容等，显得很累赘，后期修改志稿时要注意把握重点，适当删减。例如《残疾人联合会志》复审稿第九章机关党的建设，建议修改时第二节和第三节重点写创新做法和主要成效，少写或不写活动过程、文件规定及领导讲话内容。《统计志》复审稿部分专业统计和统计调查内容记述过于详细，后期修改时建议适当压缩细节过程，重点记述其统计、调查结果，以彰显北辰经济社会发展脉络。

4.文件内容不宜抄录，文牍慎入

文件的原文不宜誊抄，简单记述文件的主旨内容即可。例如《行政审批志》复审稿第三章援引了19个文件部分原文，有的年份只援引文件，缺少记述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的行为，即缺失史实的记述。这种以复述文件内容代替记事的方法不妥，修改时宜加行为动词，重点记述本单位的实施情况、主要措施、最终结果等，修改志稿时将文牍改为行为。如文件对本单位工作举足轻重，可将该文件收入附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志》复审稿第七章第一节第二目多为摘录文件内容，修改时不宜照搬文件原文，简要记述或交代即可。

四、修改稿件注重把握好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1.处理好一般性与特殊性资料的关系

主要考虑入志资料的占有及使用，善于从

资料中寻找具有地方特色、具有事物特殊性的资料，给予重点记述，而将一般性、普遍性资料尽量剔除出去。例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志》复审稿第八章关于劳动人事部分工资改革的记述，在后期修改中建议简化上级政策性规定内容，重点记述落实情况，各年度数字列表说明。

2.把握好主线与节点

重在把握节点的记述。要把握好节点，不要记成流水账，在此基础上可以合理地跳跃，要敢于跳跃，还应善于跳跃。例如《体育志》复审稿第五章竞技体育第四节关于“跆拳道”的记述很详细，缺失了2006年到2008年3年间的资料，但这种情况属于合理跳跃，不属于断主线。此外，除了不能断主线以外，还要记述好事物发展的脉络，而不是像写日记那样按时间顺序一一记录事物日常表象。为避免流水账，就要注意写好节点、折点，特别是关键时间点、节点上的招法举措应详细记述，不仅记述事物发展的完整过程，还要反映事物发展的变化轨迹。《行政审批志》复审稿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目“审批”完全是挂流水写法，将审批工作件数等按年月逐条记录下来，看不出其中的重点、要点，修改时建议每年的常规性工作合并记述，个别年份的亮点、特色工作单独记述。

3.把控好新老单位建置沿革的轻重关系

部门、单位的建置前志已有的、无变化的不写，有变化的只记述变化，可在无题序中做简单记述。新设立的单位，前志无记载的，可以简记建置，不记各科室设置情况。例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志》复审稿第一章机构沿革，只记述现在人社局的机构沿革是不合理、不科学的，要上溯事物发端，写清以前只是人社局时的机构沿革情况，也要写清后来只是劳动局时的机构沿革情况，而且人社局和劳动局从历史上一一直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修改时应着重

注意，并把每个历史阶段当时的机构沿革记述清楚，切实符合事物的实际发展情况。《红十字会志》复审稿中提到1958年，境内便有了红十字会组织，但由于历史资料较为匮乏等原因，修改志稿时其组织机构着重从2005年正式成立红十字会独立设置开始详细记述，展开介绍红十字会的组织沿革、机构设置、主要负责人情况、历届理事会、基层红十字会的相关情况。

4. 把握好随文附的选材和节选

文件规定、意见等尽量不选作随文附。属于措施招法之类，不宜作附。典型事迹、媒体链接等作随文附时，应根据资料的篇幅大小决定是否需要做节选。例如《房地产志》复审稿第十四章物业管理，在安全保卫内容的记述中，写了一件见义勇为事例，修改时建议将事例再充实内容，作为随文附使用；该章关于设备设施维护内容也写了事例，建议从正文移出作为随文附使用；该章信访件办复里面写的两个典型案例，建议作为随文附。

5. 把握好事物选介的内容繁简

内容的选介不宜超过正文标准。例如《农业志》复审稿第十八章第二节第二目龙头企业选介中大部分子目缺失下限情况，有的缺失上限，个别的只记述了1年的情况，明显记述不完整，修改时要注意补充相关资料。

6. 把握好一个事物的“两面一线”

“两面”是指续志的上下限年份记述，即事物的起始面和终止面。“一线”是指事物发展的主线。避免头重脚轻、肚子大两头小；部门志、专业志志稿中必须要有下限横断面的介绍。例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志》复审稿第三章就业及培训第二节再就业优惠政策所记述内容未到低限，修改时需收集资料，予以补充。《检察志》复审稿第五章情况表、示意图，内容不到下限，修改时建议补充2017年下限数据。

7. 把握好图表内容的入志标准

在部门志、专业志志稿中，“图少表多，有表无文”现象较为突出。图表前应有精当的文字说明，主要用于记述图表的内容以及规律、发展、变化等情况，尽量避免裸表相连。还应注意表与文字、表与图的转换。对于不符合入志标准的图表一律删除，部分符合标准的可以用示意图、函数图表达。例如《财政志》复审稿数据较多，财政收入均为单项表格，改做19张示意图，更加直观。此外，志稿中还应考虑到图、表、文字说明需一致的问题。例如《民政志》复审稿第八章两个示意图的图内显示企业数与图外标注的企业数不一致；两个示意图与情况表中的企业数不相同，修改时应注意核实前后数据，力求精准一致、相互对应。

8. 把握好正文内容的入志标准

严格掌握大事记标准，不属大事、要事不入大事记。例如《党校志》复审稿关于大事记的记述不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记述内容较多。如参加区歌咏比赛、到外区或外区来参观学习等，只记主要领导任职，各种原因免去职务的可不记，市级及以上荣誉建议在大事记中予以保留，区级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移至荣誉章中进行记述。还有一些党校自身常规性工作、分量轻、规模小的活动可不入大事记，修改志稿时要适当给大事记做“减法”。

9. 精心谋划，各节、目、子目设置妥当

首先是要保证分类记述，互不矛盾。立题界限要清晰，避免出现交叉重叠。事物是复杂的，尤其要注意妥善处理各种交叉关系。例如《财政志》复审稿第十八章人物中的荣誉表，参加体育比赛、歌咏比赛获奖及组织奖不应混在先进集体、个人荣誉表中，修改志稿时可放在工会、共青团组织活动中进行记述。其次，需要考虑

(下转第59页)

天津俄租界的代管与接收

曲振明

近代天津曾建有九个外国租界地，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对外国租界进行接收。其中 1917 年，北洋政府参加欧战协约国，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收回了天津德租界和奥租界。1917 年十月革命，俄罗斯沙皇被推翻后，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曾于 1919 年和 1920 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和租界。但对俄租界的接收，经历了代管与接收两个阶段，回顾这段历史有许多内容值得记述。

一、天津俄租界的基本情况

1861 年天津开埠后的第二年，沙皇俄国在天津建立了领事馆，同时开始通商。但比起其他国家，俄国在津的商务不多。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沙俄军队付出很大代价，俄国人认为“为保护别人的利益遭受了牺牲”。^[1]俄军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打算长期占据俄国兵营驻地 and 北洋武备学堂所在的海河东岸，计划在此地为入侵天津而阵亡的俄国将士修一座公墓，并建造一座小教堂。当时，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提出把北洋武备学堂交联军共管，立即遭到阿列克谢耶夫反对。俄国人建公墓和教堂的动议，又引起建立租界的想法来，随即俄国国旗在北洋武备学堂房顶和河东盐坨上升起，并在海河东岸插上写有“奉军事当局命令占用此地”

字样的牌子，企图将预备划为租界的地方固定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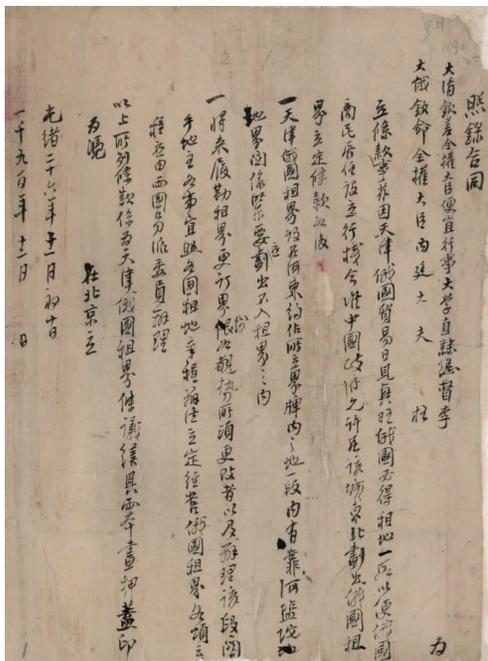
虽然如此，建立俄租界的事并未立即确定。此刻，汉口来的茶叶商莫洛特科夫起到了推动作用。他提出需要货栈存放茶叶，并主动向俄国领事馆申请在未来的俄租界购置一块地方。接到莫洛特科夫的申请后，俄国驻津领事珀珮便把这份申请送给道胜银行经理璞科第，并请他帮助答复。璞科第是沙俄财政大臣威特的密友，立即将关于租界问题申请和莫洛特科夫的申请，一并转呈威特。同时驻津俄军统领利涅维奇将军也向沙俄陆军大臣提出租界问题，于是引起沙俄政府的关注。不久，建立天津俄租界得到了同意，并确定由璞科第负责办理租界范围和制定财政规章等事宜，还称将“俄军打过仗的那个地段，包括东局在内都应划入租界范围”。^[2]不久，利涅维奇将军通过领事馆发出一个“根据征服之权利占地”的通告。由于河东一带涉及英国、德国及日本商业利益，立即遭到三个国家的反对。

俄国人看出，如果继续拖延占地是不利的。为此，沙俄政府计划通过俄国公使格尔思将设立租界的意图传递给李鸿章，以便迅速达成租界协议。李鸿章当时考虑正值俄、法、德三国出面干涉，让日本归还占据辽东土地之际，即“现

[1] (俄) 科罗斯托维茨著，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俄国在远东》，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165 页。

[2] (俄) 科罗斯托维茨著，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俄国在远东》，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168 页。

值东三省商议交还，事机甚切，姑从所请”。^[1]随后，李鸿章与格罗思草签一个合同，后指示直隶后补道钱鏞、天津河间道张莲芬与俄国人继续谈判。1901年5月19日，中俄双方正式开始谈判，俄国人将事先准备好的地图拿出，“上自先农坛对河盐坨起，下至土围子（濠墙）门外世昌洋行煤油栈边止，东北至铁路，西南至海河，约计界内之地有五六千亩之谱”。^[2]看到这幅地图后，双方各执一词，争持不下。



1900年12月31日天津俄租界草合同

经过多次谈判，最终确定了俄租界面积，其位置为：东至二经路，西南至五经路，北起铁路，西临海河，南至十五经路。所占海河岸线相当于海河右岸英、法、德三国租界河岸线的总长。对于俄租界的总面积，各种书籍则有不同记载：英国人琼斯著《天津》记载为5334

亩；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的《列强在中国的租界》记载为5474亩；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1年版《河东区志》记载为5971亩。据1936年《天津市财政局为报送本市新旧区域及特别区各租界面积亩数表呈市政府》文件附表，旧市界特别三区（即俄租界接收后名称），面积亩数5334亩。其“所填亩数系根据前土地局所测制旧市区界面积亩数蓝图填列”，^[3]由此可见，5334亩的说法是可信的。

俄租界设立后，并没有进行较大投资与建设。但各种市政收入和支出逐年稳定增长，最初几年只不过几千元，到1917年收支总计已达到226350元，其中收入106350元，支出120000元。

二、俄租界的代化管理

1917年3月，俄罗斯帝国爆发二月革命，导致沙皇下台，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并存的局面。最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左翼（布尔什维克）联合其他极左翼政党在圣彼得堡发动起义，于1917年11月7日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史称“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改国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倡议归还租界，当时的北洋政府尚不敢贸然接收。由于苏俄退出了英法俄的协约国阵营，引起西方各国的疑虑，立即采取与苏俄对抗的立场。相应对归还租界问题加以干涉，理由是俄租界内有他们的工商利益，有大量的英美日国的私人不动产。此时租界的管理者仍为沙俄旧政权的人，他们也欢迎西方列强干涉，所有在津的俄国商号一

[1] 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5页。

[2] 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7页。

[3] 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6页。

度都悬挂其他国家的国旗。当时的北洋政府因租界内有西方各国的利益，也未敢过问，天津俄租界继续由俄国临时政府指派的白俄领事控制。

1918年，苏俄政府外交委员加拉罕向北洋政府发电报，表示放弃沙俄时代在华取得包括租借地等一切特权。而天津地方人士也呼吁北洋政府收回俄租界，但是在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干扰下，使得收回工作始终不得落实。

1920年9月，北洋政府计划收回沙俄在华的一切利益，停止原驻华俄使、俄领的外交往遇，并准备接收俄租界，立即遭到西方国家群起反对。9月25日，天津领事团召开会议，呼吁中国暂缓接收。声称供天津各租界需用的铁路、车站及由车站通至租界各条马路都在俄租界内，还有跨越河流极有军事作用的桥梁，将来管理权属于中国，难免会生变乱。为此，北京公使团领袖西班牙公使巴士多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建议由外交部与公使团会同商定办法。指出居住在俄租界外国人由中国管理，难免会引起法律及国际上之纠纷，遂建议俄租界由中外共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护俄租界内之外国人利益，一方面可以协助中国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1920年9月15日，北洋政府直隶省交涉员黄荣良会同天津警察厅研究接收俄租界事宜，最终在驻北京公使团干涉下，北洋政府同意天津俄租界工部局一切照旧运行，但治安权由天津警察厅管理。最初准备在工部局大门悬挂“天津警察厅管理俄国租界警察局”的牌子，后觉得不妥，又换成“中国政府代管俄国租界工部局”的门牌。

根据北洋政府外交部由直隶交涉员代行俄国领事权益的命令，1920年9月30日，位于俄租界的俄国领事馆降下了沙皇俄国的三色旗，



俄租界工部局

同时升起了中国国旗，围观群众中发出了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此后，俄国侨民因领事被撤销，遇到情况转向工部局求助，但遇到工部局职权范围外的，往往置之不理。直隶交涉署接管俄国领事馆后，成立接收俄界组织代行俄领职权办公处，设副主任常驻，另外聘任原俄国副领事索古诺夫和俄文、英文两位翻译留任为办事员，办理在津俄侨的一些事务。

三、代管时的土地纠纷

俄租界代行管理后，工部局成立了租界自治委员会，会长为直隶交涉署交涉员黄荣良，董事有道胜银行经理斑定贲、开滦矿务局经理那森、太古洋行经理群斯。其余三人为中国人。董事会下设卫生、工程、巡捕三项工作。由于治安权归天津警察厅管理，不久，一支中国武装巡警开进了俄国租界；虽然当时还有一支在工部局指挥下的俄国巡捕存在，但也立即承担起维护治安的责任来。奇怪的是，中国警察仍着装俄国巡捕制服，原工部局局长惹波拉斯基改为顾问留用。代管俄租界工部局后，首先遇到了土地出售的问题。

由于工业对俄租界土地需求的日益增长，自1917年以后，平均地价飞速上涨，一亩地从几百元涨到1000多元。随着土地价格的增长，租界的市政收支也在增长。1922年，俄租界财

政收支差不多增长了 100%，总计达 431400 元，其中收入 208400 元，支出 223000 元。

在俄租界代行管理前，出售土地积累的资金以俄国政府的名义存放在华俄道胜银行内，当时存有将近 50 万元之多。由于废止原驻华俄国公使、俄国领事的外交待遇，接管后的俄租界工部局既无法利用过去累积的资金，也不能使用出售现有土地所得的收入。工部局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担保借款用于租界的发展，只有依靠当时的地税、房捐以及一般税收的收入，而且这些很难应付当时的支出。

1923 年 6 月，媒体披露继任直隶交涉署交涉员祝惺元利用代行俄国总领事的名义，在省长曹锐的鼓动之下，准备出售俄租界内未开发的部分土地。相传俄租界沿岸有空地 1800 亩，经中日实业公司介绍，日商出价 180 万元准备购买。祝惺元在 1923 年 6 月 27 日致工部局的信中，声称他收到一份购买尼古拉路（今六纬路）与乌拉尔路（今八纬路）之间所有未占用土地的购买申请，因而他要求工部局主管官员提供一式四份内容包括所需详情的总平面图，并且说这些土地将严格按照最新估定的价值出售。这一举动，受到俄租界自治委员会外籍董事的反对。适逢曹锟选举总统，人们认为出售俄租界土地于日本是急需资金用于总统竞选的丧权辱国行径，即刻遭到天津社会团体的反对。

1924 年，北洋政府完成了俄租界的接收，苏联领事馆正式挂牌。北洋政府又计划将 1800 亩土地转售美国公司，亦遭到苏联领事馆反对。1925 年 1 月，天津苏联领事馆发出通告“查此项地亩乃前俄政府买自华人以后拆卖之余下者，



1925 年 1 月 8 日《大公報·前俄租界土地出賣案尚有問題》

现归苏联政府承受，华人尽皆知之。所有一切凭证契据，现皆存于北京苏联大使馆内”。^[1]不久，驻华大使加拉罕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但北洋政府认为这是中国的官产，外国人无权干涉。1926 年，直鲁联军军阀褚玉璞决定，对这 1800 亩土地进行拍卖，所得资金完全划归直隶省银行。但直隶银行不能独自进行土地拍卖，于是交给直隶官产旗地荒地清理管理处办理。最后在特三区政府的协助下，完成了土地拍卖，所得资金的 20% 留给特三区用于市政建设。

四、俄租界正式接收

1924 年 5 月 31 日，中苏建交并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十条规定，“苏联政府允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协定等所得之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权及特许”。^[2]根据这条规定，接收俄租界提到北洋政府的正式议程上来。

自中苏协定签订之后，直隶交涉署多次召集会议，讨论接收办法。讨论之时，汉口俄租界已先行办理接收，原有董事会仍继续存在，

[1]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选编》，1999 年，第 283 页。

[2] 张立志编：《中外条约汇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世界书局，1930 年 2 月，第 5 页。

并继续享有租界财政租税管理权，中国方面仅限于警察管理职权。这样的做法，天津俄租界四年前已经如此。然而外交事务最重先例，有汉口之先例，天津接收颇为棘手。直隶交涉署经过认真研究，一方面呈请直隶省长曹锐，请其坚持取消租界董事会的主张；一方面与租界董事会各位董事接洽，表示中国当局之决心，并晓以大义。经过与各方反复研究商讨，终于达成一致意见。8月1日，直隶省长曹锐正式下令取消俄租界自治会。

1924年8月6日下午，直隶交涉署交涉员祝惺元率同交涉署秘书董显光、科长曾照伯，在俄租界工部局召集全体董事大会。俄租界自治会董事道胜银行行长斑定赉，开滦矿务局经理那森，太古洋行经理群斯等出席。会上，祝惺元宣读省长命令，称中苏协定签署之后，俄租界即为中国土地。而租界内自治会是根据沙俄政府所批准的租界章程而成立，应当随着租界消失而取消。准备委任中国官员管理该界，今天交涉员督率部下到此办理移交。那森代表全体董事发言，同意取消自治会，但提出原工部局办事人员劳绩素著，愿中国政府仍让他们继续在此任职。最后祝惺元发言，对各位董事的协作，使本界有今日之结果，表示感谢！并称界内居民财产利益，中国政府自有相应保护办法。原工部局职员为自治会办事忠诚，中国政府会认真对待。新局长接任之后，会详为审别，当酌留数人。对不能留用者，也会有公允宽厚之待遇。从此天津俄租界正式接收。

俄租界平稳接收后，直隶交涉署于9月4日在交涉公署宴请旧俄租界自治会各位董事。席间，各董事获得了省长颁发的纪念章。交涉员祝惺元希望今后该界有事，还需得到前董事们帮助者。各位董事当场皆表态无不尽力。

天津俄租界正式接收后，更名为特别三区。8月9日，直隶省长曹锐转令警察厅由特别三科主任丁振芝接收旧俄租界自治会职权。原工部局巡捕100人改编成警察，另增加100名保安队保护英美侨民及特区的安定。那时特别区与华界有不同之处，存在一种义务捐，又名地租，每年此款收入甚丰，专备维护街道等公共事宜。但当时特别三区地租收入不敷使用，为此增加的保安队仍得由天津警察厅发放工资。

五、苏联领事馆正式设立

1922年12月，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1924年5月，苏联与北洋政府恢复邦交后，任命了大使和各大城市的领事。原定驻天津领事为海文氏，但不久俄驻华大使改任其为驻张家口领事，天津领事委任吉达克夫充任。吉达克夫于1924年10月1日到津，2日接到大使委任书，4日赴直隶交涉署，说明已奉令充任天津领事。



苏联驻津领事馆

10月5日中午，苏联领事馆举行升旗仪式。苏联侨民及中外各界来宾约有200余人，齐集于领事馆花园。上午10时起，由万国桥过河而来参与典礼者络绎不绝，俄国人环围演说

台，欲一瞻新领事之丰采，并表达欢迎之意。直隶交涉员祝惺元、警务厅长杨以德，特别三区主任丁振芝应邀出席典礼，其他西方各国领事并未出席。典礼开始后，军乐大作，当苏联国旗升起后，来宾鼓掌欢呼。苏联国旗为红色，上缀镰刀和铁锤，并一枚五星。新任苏联领事馆领事吉达克夫用俄文演说，后由副领事译为英文。演讲大意为“红色旗乃俄国工人为争自由而奋斗之标志，今乃为世界工人自由运动之标志矣。苏俄领事馆抱和平亲善之意，与邻邦为友谊的联络。苏联共和国予平民以莫大之福利，余敢断言帝国主义渐趋末日。世界爱和平亲善之民族，应速起而联合，向前途寻光明路”。^[1]

由于天津有大量的沙俄时代的遗民，他们极力干扰苏联领事馆的工作。为此在典礼之前，吉达克夫专门拜访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请求在典礼这天给予保护。杨以德答应了他的请求，派出警察维持秩序，但白俄对苏联领事馆干扰始终未断。

1925年10月，北洋政府外交部针对在华俄国人存在白党与红党之争，对俄侨制定管理办法，命令知直隶交涉署，转苏联领事查照。其办法条例：（一）俄人欲居住中国内地者，须领取居留执照。（二）俄人领取居留执照时，应先明确是苏联国籍或为白党，然后发给。（三）领取居留执照，须缴执照费二元，并贴用印花一角。（四）俄国人无居留执照者，认为违反国际公约，加以处罚。（五）俄国人归国或出境时，居留执照即失其效力。随后，还针对白俄成立侨民保卫团的事情，又发出了禁止

命令。

苏联领事馆成立后，波折很多。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领事馆随之撤销。1932年12月，双方互致邦交换文，重新建立国家外交关系，又恢复领事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天津苏联领事馆，改为日本海关办公处。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天津苏联领事馆复馆，派多洛菲也夫为副领事代理馆务。1947年9月，发生了国民党兵枪击领事馆大楼与在领事馆花园采花事件。时任总领事顾德夫向天津市政当局提出保护申请，引起外交部的高度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苏联领事馆于1950年举办纪念十月革命鸡尾酒会，当时在津的梅兰芳先生作为中苏友协理事应邀出席，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光阴荏苒，天津俄租界成为前尘往事，但前俄国领事馆的建筑依然保存完整，见证了曾经发生在海河东岸的一段屈辱的历史。

参考资料：

[1] 张立志编：《中外条约汇览》，世界书局，1930年2月。

[2] （俄）科罗斯托维茨著，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俄国在远东》，商务印书馆，1975年。

[3] 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4]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选编》，1999年。

[5] （英）雷穆森著，许逸凡、赵地译：《天津租界史（插图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供稿单位：河东区地方志办）

[1]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选编》，1999年，第283页。

天津早年的冰上运动

张绍祖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022年2月4日至20日在北京和张家口举行，笔者不由想到了天津早年的冰上运动。

一、撑冰床与跑凌鞋

天津滑冰的历史很早，这与天津自然环境关系密切。天津处于九河下梢，河流、湖泊、湿地多，河湖港汊交织一起，冬天一结冰就形成了天然冰场。清代张焘编撰的《津门杂记》初刻于清光绪十年（1884），距今近140年，作者张焘，祖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长北京，幼年随父侨寓天津。他博学多才，工书善绘，通医术，懂外文。寓居津沽三十年，留心采访，



天津人在河上撑冰床

随时记录其耳闻目睹、身所经历的一些事件；又在稗官野史中细心搜集有关天津古迹、形胜、奇事的记载与诗篇。此书是通过实地采访与参证文献记录的两种方法辑成。书中记载了天津寒冬滑冰的情景：“冰床，又名托床，俗呼冰排子。其形如床，可容三四人，高仅半尺余，上铺草帘，底嵌铁条，取其滑而利行。人坐其上，一人支篙撑之，驰骤甚速。每到天寒水冻，冰排盛行，往来密如梭织，四通八达，攸往咸宜。撑排者，例备皮袄一袭，无客则白衣御寒，有客则奉客铺垫。随地雇坐，其价甚廉，如去一二十里之遥，所费不过京蚨数十文而已。贫民食力于风天雪地中如此。又有所谓跑凌鞋者，履下包以滑铁，游行冰上为戏，两足如飞，缓疾自然，纵横如意，不致倾跌。寓津洋人亦乐为之。借以舒畅气血甚妙。”书中附《跑凌鞋》诗一首：“往来冰上走如飞，鞋底钢条制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头南脚北手西东。”^[1]

二、现代滑冰传津门

1860年后天津开埠，相继建立了九国租界，随之现代滑冰运动传入天津。1893年，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开设有体育课程，把一些近代西方体育项目引入学堂。据该学堂学生王恩溥在《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文章中回忆那时

[1] 来新夏主编：天津风土丛书《津门杂记·天津事迹纪实见闻录》，清张焘撰《津门杂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3—94页。

“校内正式体育课程，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算术比赛、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杆及爬山运动等”，^[1]北洋水师学堂遂成为我国最早开设体育滑冰课的学校。1891—1894年，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就读时上过滑冰课，1919年，他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也开设了滑冰课。

天津租界学校也相继开设滑冰课。如1887年由天津法国天主教会在法租界圣鲁易路（今营口道原滨江医院住院部）开办的圣鲁易中学（男校）；1907年德国人在德租界威廉街（今解放南路）创办的德华普通中学堂；1914年由圣芳济圣母会在大法国路（今解放北路）创办的圣若瑟女校；1921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六里台创办的中日中学校（原名天津同文书院）等都开设了滑冰课。



法租界圣鲁易中学大楼前冰场

19世纪80年代，天津夏季雨量大，洪水漫溢，到了冬季，田野冰封一片，使得冰上划艇运动兴起。几乎每个冬季，都有一大队划艇在马厂道（今马场道）不远的10英里长的赛道上竞赛。其中，那些获得最大成功的划艇的名

字，反映了天津租界社会的国际特征。著名的划艇有“飞速”(Swift)、“火箭”(Rocket)、“埃德尔维斯”(Edelweiss)、“克利奥佩特拉”(Cleopatre)、“雪花”(Snowflake)、“神翼”(Fleetwing)以及“猎鹰”(Falcon)等。中国官员们沿着马厂道散步时经常停下来，以相当惊奇的目光观看这些飞速滑动的快艇，这些快艇在大风里，能在15至18分钟里跑完全程。^[2]

天津最早滑冰的人是租界里的外国侨民，尤其是北欧、北美侨民，他们把西方现代冰上体育运动传入天津，最先接受冰上体育运动的是富家子弟。1895年，天津英租界成立了天津滑冰俱乐部。

三、津沽冰场遍地开

天津最早的冰场是英租界球场滑冰场（今新华路体育场），1895年对外开放。英国滑冰场是冬天由球场经过人工浇水而成，“冰场长约七八丈，宽约八丈，四周用双层苇席包围，用木柱和竹篙支撑，上面完全用铁架和席竹制成；配有灯光、著名的英国球场滑冰场乐队，如遇风雪及晚上，滑冰者无妨，设有看台和小食部，冰场先用自来水送水三寸，等结冰后铺上一层土，等天气严寒时，再放水三寸，冰层



著名的英国球场滑冰场

[1] 王思溥：《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三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年5月版。

[2] 英·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本），《天津插图本史纲》第八章城市建设的先驱者1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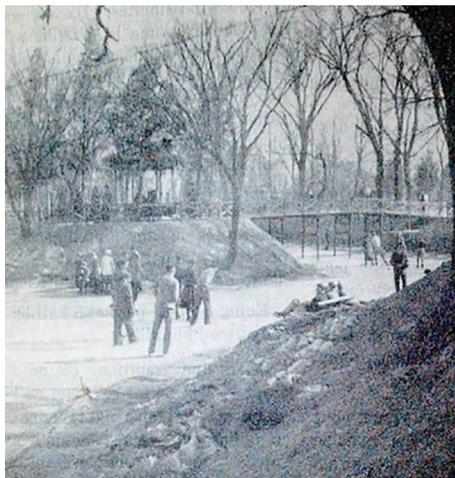
厚度为六寸极为坚固，开放时会费颇贵云”。^[1]室内冰场样式，分为一大一小两部分，小冰场专为儿童和初学者设立。英租界滑冰场规模最大、管理最完善，在天津各冰场中独领风骚。冰场借原天津网球会网球场场地，面积 800 平方米左右，设施完善。1937 年加入的会员超过 800 人，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华人。

1906 年，美国兵营开辟冰场，开展滑冰运动。20 世纪 20 年代，国人开始参与滑冰运动。1927 年冬，意租界滑冰场筹办，由住在意租界的张杏亭、曾世英等人组织实施，1928 年 1 月 9 日开业。当时在此滑冰的人，国人与侨民各占一半，是滑冰运动在津普及的开始。^[2]

国人掌握滑冰技巧后，冰场需求加大。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是天津较早开展冰上运动的学校。1928 年天津建市后，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于 1929 年 12 月设滑冰场。南开中学冰场设在室内，直径近 300 米，长期到这儿运动的男中、女中、小学部师生达 400 多人。南开大学冰场则是露天的，利用思源堂旁莲花池作为师生锻炼滑冰的场所。1931 年，滑冰场又增了五处，有英国乡谊俱乐部南部冰场、日本宫岛街冰场、汇文中学冰场、宝士徒道冰场、特一区陶园冰场。

1932 年，天津市立公共体育场利用原有水塘开办冰场后，天津的冰场达 10 处之多。至 1937 年，天津的冰场达 30 多家，比较有名气的滑冰场 12 个。其中，天津工商学院利用东面一个足球场搭了个席棚，大约有半个足球场面积大，里边分两个区域，外边一圈跑道是给速滑运动员预备的，中间是个方形的场地，给练习花样滑冰者和初学者准备。根据 1937 年 1 月

调查显示，市政部门管理或直接经营的滑冰场设施最好、管理水平最高的是 1932 年建的北宁公园滑冰场，利用公园内的湖面，用一些草席和木板围成一个大圆圈，供爱好滑冰的民众使用。对外开放分为上、下午场次，吸引了附近河北工业学院、河北法政学院、北洋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等校师生，平均每天在此滑冰的有百人以上。宁园冰场虽为露天，但湖面广大，曾经举办过天津市冰运会，是著名的滑冰场所。俄国花园滑冰场临近海河东岸，位于原俄租界，是利用公园水系形成的天然冰场，下雪之后，环境更加安谧、幽美，冰场由商人承包经营。因为地缘关系，在此滑冰的绝大多数是俄国侨民。



俄国花园滑冰场

另外还有一部分天然河坑冰场。如海河及九河下梢的南北运河、子牙河及青龙潭（今水上公园前身）、西湖圈等，一到冬天就成了天然冰场。

在众多冰场中，有三个特殊的冰场。一是静园小冰场。1929 年 12 月，居住在静园（今

[1] 《英国大球场室内冰场》，1929 年 2 月 11 日《大公报》。

[2] 李琦琳：《旧时津门冰场遍地开》，2022 年 2 月 7 日《今晚报》天津卫。

鞍山道 70 号) 的逊帝溥仪对滑冰产生了浓厚兴趣, 据当时《大公报》载: “近闻蛰居津门之溥仪氏曾积极练习滑冰, 现已运转自如, 不致倾倒。并又在宫岛街陆宗舆故宅, 建筑一小滑冰场, 逐日练习, 请日人池田担任指导。按此君素好运动, 往者只闻其长于网球及脚踏车, 现又练习滑冰, 可见其对于运动之兴趣云。”^[1] 1931 年 1 月, 溥仪曾派人去北京东四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 以当时 2000 元的总价购买了滑冰鞋 10 双、足球 10 个、网球 20 个。二是中国银行的津中里滑冰场。津中里是中国银行为职工建设的住宅区, 在今汉阳道、云南路、贵州路围合地块内。当时这里附设子弟小学——津中里小学, 滑冰场就在小学前面, 专为中国银行职员及其眷属使用。由于银行财力雄厚, 冰场面积约 1000 平方米, 设备完善, 更衣室宽敞。^[2] 三是梁炎卿大院内的冰球场。近日, 笔者路过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 201 号天津医药公司医疗器械批发站, 在其唐山道一侧安君里围墙下砌部分, 洋灰脱落露出了一块块饱经沧桑的城砖, 不由想到此地那座用天津城砖盖起的梁炎卿大院内冰球场。梁氏姐弟佩瑶、佩瑜、宝奎、文奎及梁炎卿的女婿、佩瑜的丈夫林宝华, 他们既是天津网球高手, 被誉为“网球”世家, 又是天津冰上英杰, 被誉为“冰上”世家。他们主要到附近的英国冰场滑冰, 平时也可在家里大院的网球场浇筑的冰场滑冰。

四、新颖的化装溜冰

张伯苓校长积极倡导南开冰上运动, 1924 年后著名体育家章辑五担任南开大学、中学、女子中学、小学四部体育主任。1927 年, 天津体育协进会 (简称天津体协) 在南开中学会议

厅召开成立大会, 章辑五被推选为会长。他带领南开健儿在全市、全国乃至国际多种赛事中取得骄人战绩, 在体育事业上的突出贡献, 不仅得到南开学校师生肯定, 还得到天津体育界的一致认可。他带头倡导南开学校参加冰上运动与举办冰上化装大会。



南大承办的全市化装溜冰大会(邱晓德先生提供)

1931 年 2 月 1 日, 《大公报》刊出消息, 为“提倡冬季户外运动及冰上技术以发达艺术化之体育”, 报社于 2 月 8 日在南开大学思源堂旁的露天溜冰场举办“全市化装溜冰大会”, 免收报名费, 因场地关系限 200 人参加, 凡具有溜冰技术或身穿奇装异服者均可参加, 但没有溜冰鞋者不能入场。这是天津人首次面向社会举办的化装溜冰比赛。大会聘请著名体育教育家章辑五任总裁判, 天津体育界名人男女各 3 名及大公报社 1 人为裁判。优胜第一名奖励银杯, 第二、三名奖励银盾。

南开学校冰上活动的主持人与积极参与者有“海怪”与“陆怪”。“海怪”叫严仁颖, 因参加南开新剧团主演话剧《谁的罪恶》得此绰号, 是南开之父严修之孙; “陆怪”张锡祐, 身高一米九八多, 得此外号, 为南开学校校长

[1] 张诚: 《故纸里的天津群众性滑冰》, 2022 年 2 月 14 日《今晚报》天津卫。

[2] 李琦琳: 《旧时津门冰场遍地开》, 2022 年 2 月 7 日《今晚报》天津卫。

张伯苓第四子。两人都是“南开”学子，亲如兄弟，酷爱体育，特别喜好冰上运动。

1931年2月8日，南开大学化装溜冰大会在大雪中举行。“海怪”严仁颖担任主持人，他负责发出拾番薯赛跑、倒跑、双人赛跑、团体传球4项比赛的指令，接着是个人自由表演。“陆怪”张锡祐是冰场上的高手，匆忙赶场临时借到短裙、风衣、小帽粉墨登场，赤腿露肘参与表演。溜冰大会上，有蓬发、小胡子饰卓别林的，扮得十分神似，并且溜冰之际不时故意摔倒，引来观众大笑；有戴着纸制罗汉面具的；有穿着白色西班牙服装的；还有扮猪八戒的……在南开大学学子中，年龄最小的周公权反穿皮袄，饰一老人，被观众称为“小老头”；周恩洪则穿红白相间的衣服，手拿弓箭，模仿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金桢弼打扮成卖包子的小贩。2月14日，南开中学室内冰场化装溜冰大会再掀高潮。体育主任章辑五致辞后，“南开”大、中学冰上健儿尽情表演。主持人“海怪”背着玩具、糖果，脸上沾满棉花，俨然为一位圣诞老人。“陆怪”肩挑一副扁担，吴慕贞装扮成护士，吴佩珉化装为骑马师，金桢弼一身朝鲜族服，方友文打扮成算命盲人给人看相。裁判分为化装和技术两组分别给出分数，化装组前三名为严仁颖、吴慕贞、方友文；技术组前三名为俞启孝、邹致圻、金桢弼。自南大溜冰大会开先河，天津俄国花园冰场、北宁公园等众多冰场化装溜冰会开始热闹非凡。^[1]

五、形式多样滑冰赛

由于冰上活动的广泛开展，天津市逐渐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冰上运动员，多数是大、中学

生。学校开始组织各种名称的滑冰队。当时的滑冰名将男子组有周惠宗、刘志聪、汪兴瑶、富国祯、赵云彪、元长林等；女子组有周惠玲、林秀莲、汪伯兰、梁贵恒、梁贵英等。

1934年1月，天津市人民第一次与外国人一起参加英国球场举办的“万国速滑比赛”。天津选手击败外国名将，获得全部冠军。元长林获500米第一名。汪兴瑶获1000米第一名。在长距离5000米比赛中，赵云彪最终击败了英国名将乔治·华米斯及澳洲名将依司脱获第一名，为天津人扬眉吐气。



北宁公园滑冰场一角^[2]

天津体育协进会从1933年起曾多次举办冰上运动会。第一次是在中日中学冰场举行。速滑分高、初级两个组，高级组四个项目由富国祯、汪兴瑶获冠军，初级组四个项目由元长林、赵云彪分获冠军。1935年1月20日，在北站体育场由北宁公园主办，比赛项目有速度滑冰、花样滑冰。

为了开展冰上运动，中国体育协进会于1935年在北京中南海举行“第18届冰上运动会”。为此，天津市于同年1月12日至13日在河北体育场冰场举行河北队的选拔赛，选出了

[1] 杨仲达、李琦琳：《近代京津民众溜冰拾趣》，2022年1月21日《中国档案报》。

[2] 图片来自民国时期的《冰上体育摄影》，倪煥章1932年摄（邱晓德先生提供）。

冰球队、花样滑冰队、速滑队。天津市代表河北省参赛，获女子速滑总分第一名，男子高级组亚军，男子初级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在全部比赛中夺得3个冠军，2个亚军，并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1936年1月，天津市体育协进会举办两次冰上运动会。赵云彪、周惠玲、汪兴瑶分别在250米、500米、1500米项目比赛中打破华北运动会纪录。天津墨艾队以44比25战胜北京先锋队。

1937年7月底，日军占领天津后，冰上运动各种比赛基本停顿。

抗战胜利后，1947年2月2日，在市立体育场由天津体育协进会主办，比赛项目有速度滑冰。1948年1月8日，在市立体育场由天津联盟体育会主办，比赛项目有速度滑冰。

六、冰球运动震四方

随着20世纪初天津租界文化的兴起，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共同决定了天津成为中国最早有冰球运动记载的城市。^[1]1905年，冰球运动引入天津，开启了中国现代冰球运动的历程。天津冰球俱乐部（Tientsin Ice Hockey Club）于1905年在宝士徒道（今营口道）靠近土围墙那头的—个结冰的池塘上举行了第一次冰球比赛。^[2]比赛进行了一小时才结束了半场比赛，比分1:0，表现突出的球员有布昌、瓦姆斯莱、钱德勒斯（R.H.Chandless）、韩特、舒尔茨（Schultze）与乔利（Jolly）。1906年开始在北京举行埠际比赛，但是比赛结果未见记载。其后，

每年都举行天津本埠赛和锦标赛。除了上面提到者外，从1906年以来，表现突出的球员还有李（J.Lee）、阿金特（W.A.Argent）、艾维（R.H.Ivy）、布赖森、霍格（Hogg）、科尔特曼（Charles Colman）、德沃斯、K·布赖森、洛伦岑（M.A.Lorenzen）、勒克、沃姆斯利、肖、诺尔斯、奥克利·希尔（Oakley Hill）、格兰姆斯（H.C.Grimes）、马克、罗奇（Roche）、西尔弗（Silver）上尉、曼利（J.C.Manley）、布里奇、布利齐（A.L.Bridge）、布斯（Hans Boos）、卡梅伦（T.A.S.Cameron）、芬格雷思（L.Fingereth）、林德伯格、莫顿以及《天津插图本史纲》作者雷穆森。1919年，北京的芬顿（J.W.Fenton）先生捐赠了“沃顿埠际杯”（Wharton Interport Cup），1921年这个奖杯就被天津夺得了。于是，地方的冰球俱乐部就用这个杯作为永久性的奖杯，自那以后大家都尽力争夺这个奖杯。从1921年到1924年，天津冰球俱乐部连续赢得了22次埠际与俱乐部之间的比赛，既打败过北京冰球俱乐部，也打败过北京海军陆战队球队。^[3]1925年，天津南开大学白熊冰球队成立。接着，天津诞生了寒霜、金刚、华光、中华、耀华、扶轮、寒鹰、青白、晶莹、墨艾等十几支冰球队。另外还有社会上的业余冰球队。以南开大学白熊冰球队领衔的天津冰球团体已经形成，如中华、北华、金刚、墨艾、寒鹰、晶莹、寒霜、青白和南敏等冰球队，在与本埠、外埠冰球比赛和与各租界地外侨冰球比赛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南大白熊冰球队很出色，

[1] 《天津：我们的下一站，冰球城市》，2018年6月12日《社会科学报》。

[2] 天津冰球会（Tientsin Ice Hockey Club）成立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行了首次比赛，从此每年都要举行地方或埠际赛，设有“华顿埠际杯”。从1921年至1924年，天津冰球会连续赢得了22次埠际与会际比赛的奖杯。源于罗澍伟主编：《天津通志·附志·租界》第九章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天津冰球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59页。

[3] 英·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本），《天津插图本史纲》第二十三章俱乐部与体育运动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275—276页。

1932—1936年曾分别战胜天津租界日外侨冰球队、俄外侨冰球队，战胜哈尔滨冰球队，征战北平卫寒队、清华大学冰球队、北平黑队和黄队，大获全胜。^[1]总之，在20世纪20—30年代，天津租界内每年都组织由多国选手参与的“万国”冰球竞赛。^[2]

从1934年到1937年，天津体育协进会或天津体育联盟会曾举办了四次有冰球比赛的冰上运动会。第一届是在1934年1月20日于市立公共体育场（五马路北，蔡家花园附近）由天津体育协进会主办，比赛项目只有冰球，有多支冰球队参赛，南开中学寒霜冰球队荣获冠军。第二届是在1935年1月12日，于北站体育场由天津体育协进会主办，比赛项目有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第三届是在1936年1月12日，于北宁体育场由天津体育协进会主办，比赛项目有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第四届是在1937年2月7日，于市立体育场由天津体育联盟会主办，比赛项目有冰球、速度滑冰。^[3]

1935年11月13日，天津评出了冰球十杰——刘炽昌（白熊队）、陆德诚（中华队）、王世锐（中华队）、沈尔昌（右卫）、关付纳（美国华侨）、管敦俊（中华队）、陈炳寿（中华队）、陆守诚（汇文队）、陆志诚（守门老将）、邹道敏（中华队）。其中一半是鼎鼎有名的中华

冰球队成员。^[4]

1949年天津解放后，群众性的冰上运动得到恢复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冰上运动非常普及，冰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等成为我市冬季开展极为广泛的体育项目之一。^[5]西沽公园、新华路体育场、铁路工人文化宫、第二工人文化宫、天津干部俱乐部等地都有人造冰场。有很多单位，如天津师范学院、南开大学等也有人造冰场。人们还利用湖面作为冰场，如水上公园东湖等。这个年代天津冰上运动如火如荼。^[6]

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圆满落下帷幕，北京成为世界唯一的双奥之城。作为北京门户的天津，冰上运动一定会进入一个新阶段，掀起一个新高潮。

参考资料：

[1] 英·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本），《天津插图本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

[2] 罗澍伟主编：《天津通志·附志·租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 谢德龙、梁瑞卿主编：《天津通志·体育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4] 来新夏主编：天津风土丛书《津门杂记·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清张焘撰《津门杂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 1905年—1937年，1947年—1948年《大公报》。

（供稿单位：和平区档案馆）

[1] 邱晓德：《南开大学白熊冰球队》，2022年1月7日《天津日报》第12版满庭芳。

[2] 《天津：我们的下一站，冰球城市》，2018年6月12日《社会科学报》。

[3] 邱晓德：2022年2月7日在天津电台新闻台“话说天津卫”节目讲述。

[4] 心青：《津市冰球十杰》，1935年11月13日《大公报》。

[5] 谢德龙、梁瑞卿主编：《天津通志·体育志》第三编运动项目第二节冰上运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12月，第243—244页。

[6] 《冰球运动曾在天津如此流行》，2016年5月24日《城市快报》悦读。

张謇与天津（下）

葛培林

九莅津门 乘海轮南下

1895年，张謇因父亲病故，曾由北京经天津南下。据其日记载：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元旦 自上年九月十八日亥正闻赴京邸，二十日 自寅正启行南奔，由天津与叔兄归里治丧。^[1]

九月十八日（引者按：11月4日） 亥刻，闻父十七日丑刻之凶问。十九日晨行，过天津，即附海轮。

二十七日 由上海抵家。入门伏地恸绝，寝苫丧次，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思之泣不可仰。^[2]

十莅津门 下榻佛照楼和德元栈

光绪二十四年，张謇入京，赴翰林院听候宣旨。他往返津门，并下榻在紫竹林的佛照楼和塘沽的德元栈。他在北京办完事后，亦由塘沽乘船南下上海。据其日记载：

光绪二十四年（1898）

闰三月十一日（引者按：5月1日） 申刻登招商轮船，遣孔驯回通。大风泊浦东董家渡。

十二日 巳初开行，出查山，稍有风浪。

十五日 寅初抵大沽口，潮已退尽，船搁沙背，遥望防营尚三十里。与张小圃鹤龄同易小舟，辰初赴塘沽时巳巳正二刻，火车已行。寓佛照楼客舍。

十六日 巳初三刻十分开车，申正二刻五分抵马家铺，易车，由南西门至会馆。^[3]

六月二日 卯刻起，赴翰林院听宣旨。又诣吏部，均行三跪九叩礼。翰林院又谒圣，吏部谒文昌并九叩，止翰林土地祠三叩，共三十九叩。午后伯福述寿州意挽留。

三日 丑正起，作辞寿州奏派大学堂教习启、与清闾堂谕假启（通州纱广系奏办经手未完）。卯初即行，读书卅年（十六岁入学为附学生员），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与健庵、衡挹同伴，寓塘沽德元栈。

四日 候船不来，闻上海宁人以拒法人攘地构衅，有一船开而人已满。

五日 卜行期，卜者云七日行，今午后当有讯。又卜叔兄事云，非交秋无望。是晚“新丰”船到。

七日 行。

十二日 早抵上海。^[4]

[1]《张謇全集》第六卷，第369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3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3]《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08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4]《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12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十一次莅津门 下榻中和旅馆

1911年，张謇入京，往返津门，下榻在紫竹林的中和旅馆。据其日记载：

宣统三年（1911）

五月十二日（引者按：6月8日）至北京。

闰六月十日 出京至天津，住中和旅馆。

十一日 周仲缓以暴疾死。

十二日 以百七十元助仲缓之丧。易园、莼生先行。柏森、厚生自京来，即去。

十三日 柏森回鄂。与西园、刘子璞至塘沽附小轮，折回军粮城观海河公司工程。技师平爵内，意大利人。此公司为中外合营，逢湾取直凡七段，今所营者第四段，可省自塘沽至紫竹林之水程一百五十里，其机器马力六百四十匹，值二十五万两，造自荷兰，一年乃成，每日夜工作二十小时，用煤十六吨，小工百名，日夜换班，人给五角，出土二千五百方，并计煤油人工及修机厂，日费三百余两，合每方一钱二三分。开广十八丈，深一丈四尺，前进至少七丈五尺，至多十二丈，平均十丈。先以人工开深八尺，广十八丈，径二十余丈之河，别安闸以引水使满，然后次第装船成而施工焉。连斗二十四周回上下，泥水合融，由大铁筒曲折上下渡于岸，俾填高六尺，土实且平，真良方也。又观其七节，泥船较小而益灵，可开小河，值一万零三百两，泥船则底有抽板，实泥于中，运送至海，板抽则泥落，而船空矣。人事之精如此，圣人在今日若复治河，岂能舍此别求妙用哉。

十四日 观罪犯游民工厂，规模极备。周览马路，又至图书馆之设置。慰廷要是不凡，

但气稍粗犷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晚饭于孙姓园。孙之父，李文忠之庖丁，其人习英语，经商，庚子致富，江宁人也。夜上“平安”船南下。^[1]

此次天津之行，张謇下榻在紫竹林的中和旅馆。另外，他在海河工程公司了解了海河裁弯取直的情况，参观了罪犯游民工厂（即小西关监狱）、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的图书馆，并在“孙姓园”晚餐。而该园之主人孙某，曾是李文忠之庖丁，即李鸿章的厨师。张謇特别记述了“慰廷要是不凡，但气稍粗犷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可见他对袁世凯推崇备至。

十二次莅津门 下榻德义楼

1912年，张謇来天津，下榻在日租界的德义楼，并与共和党人谈话，出席共和党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另外，他还专门拜访了直隶都督张金波。据其日记载：

民国元年（1912）

七月二十一日（引者按：9月2日）至下关住盐局。

二十二日 渡江乘津浦车行至徐州站，宿，次日上车。

二十四日 七时半至天津，宿德义楼。

二十五日 共和党党员多人来晤。访平爵内，同诣比领事谈通借款。

二十六日 共和党开欢迎会。访沈雪君，闻其避兵出京，借种植园传习所。

二十七日 与张岱杉谈。王饶生、蹇季常来。访张今颇（引者按：即张金波）都督，年七十矣。

[1]《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55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二十八日 早车入都，借住东城西堂子胡同刘聚卿宅。^[1]

张謇下榻所德义楼，据1931年1月13日天津《益世报》介绍：“日租界旭街有饭店德义楼者，亦系旅馆，前清庚子年间，即已开设，始创者为王少芹、孙佩珍等，店系西式三层楼房，其中三分之二属于日本建物会社，余系訾质甫产业，德义楼每月须付日会社及訾某租金六百五十余元，房间分二等，贵者二元五角，贱者二元，统计全店有九十多间房屋每月收入除抵支出外，获利无几。现有旅客六成以上，旅客中以军政界居多，商次之。据该店中人云，民国初年，所有南来北往之大官僚，均客寓此店，不谓近数年来，津市大旅馆辈出，若辈大人物，均喜新弃旧，对此有长久历史之德义楼，悉裹足不前，言时似有不禁今昔之慨者，最近小达子李万春，曾住该店，刻已迁至春和戏院旁矣。德义楼尚有中西餐部，全餐一元五角，冷热单吃各一元，菜饭极可口云。”^[2]

此次张謇由北京南下，途经天津，并在津乘车赴汉口。据其日记载：

八月二十五日（引者按：10月5日）与竹君诣美使嘉乐衡，午后与苑生诣天津。

二十六日 自津返，留书与梁任公（引者按：梁启超）。

二十七日 诣洹上（按：指到彰德府，今安阳）。

二十八日 早车启行赴汉口。^[3]

十三次莅津门

1913年10月，张謇由浦口至北京，道经天津。1914年4月，张謇由北京经天津南下。据其日记载：

民国二年（1913）

九月十五日（引者按：10月14日）夜十时至浦口。晨五时登车，六时开。

十七日 上午十时至津，下午三时至京。乘三（引者按：熊希龄）、任公来晤拟小休，寓农林部东院。^[4]

民国三年（1914）

三月九日（引者按：4月4日）早六时启行，十二时由津开车。

十日 午后一时抵浦（按：浦口）。^[5]

十四次莅津门 参观了展览会

1914年6月，张謇乘车过天津。7月12日，张謇偕同人在天津参观了展览会，当天返回北京。据其日记载：

民国三年（1914）

闰五月一日（引者按：6月23日）阳六月廿三号。午后三时至济南。

二日 上午六时半改车行，三时过津，七时至京。

二十日（引者按：7月12日）星期日。与陶、陈、田、恽、管、许至津参观展览会

[1]《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70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676页。

[3]《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71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4]《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83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5]《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90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引者按：天津展览会，当时设在天津河北公园内，即今中山公园)。大热。早五时往，晚七时回(按：回北京)。^[1]

十五次莅津门

1914年12月底，张謇进北京，路过天津。至1915年3月上旬，张謇由北京南下，并没有在天津停留。据其日记载：

民国三年(1914)

十一月十一日(引者按：12月27日) 八时过江至浦口，九时开车。

十二日 午后三时至天津，秉初来迓，厚生、继兴先至。八时至京。

二十五日 天津张云阶自通来(按：指来北京)。^[2]

民国四年(1915)

正月二十三日(引者按：3月8日) 早五时行，仅留李庆守局。夜七时四十一分抵山东崮山宿。^[3]

诗赠寓居天津的梁启超

1915年3月6日，张謇给在天津的梁启超寄去题为《寄任公天津》七律一首：

笔破乾坤舌雷雨，别十四年不得语。
将舒将惨战阴阳，子归三年同听睹。
人生离合哪可期，功名有命无是非。
云昏辽左鹤正苦，春冷江南莺懒飞。^[4]

与严修通信

1915年6月，张謇在《致严修函》中，对严修表示要赠给其所办的养老院500元，深表谢意，内容如下：

范孙先生大鉴：

前辱惠临，诸承教益，下走受赐多矣。复蒙慨赠养老院五百金，以菩萨慈心，发罗汉宏愿。老老及于东海，善善既于南州。敢不受拜，以彰大惠。该款祈汇上海通海实业公司转寄为荷。专谢。敬请大安。^[5]

1915年7月6日，张謇再次《致严修函》，感谢已经收到了严修赠给养老院的500元，内容如下：

范孙先生大鉴：

昨奉惠书，并赠养老院款五百元，已转院谨受，取有收条奉察，院则更当登报以扬大惠也。萧君本昔年同谱，踪迹久疏矣。呈稿展诵一过，知于水利颇具热心。惟尚有商榷之处，如云以赈款兴水利，此乃以工代赈之法。今行之者数省，但可治标而不可治本也。若谓以一年之款兴办，无论全国，恐一省水利之大者亦不给也。又谓水利兴即得台帐(按：原注释云：原文如此。“台帐”似系“公帐”之误。公账为国家财政之隐语)之实际云云。水陆测量，本自不同。禹之则壤成赋，在敷土奠山川修沟洫之后者，盖当时行政之秩序，而得治水间接

[1]《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94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3]《张謇全集》第六卷，第700—701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4]《张謇全集》第五卷，第174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5]《张謇全集》第四卷，第347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之利益，固非可直接言之也。鄙见如此，公谓何如？萧君谓何如？专肃。敬请大安。^[1]

这封信的原件注明：“寄天津文昌宫西”。这个地址，就是严修的老宅。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当时为中华民国参政院参政。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也是天津的著名书法家之一。这两封张謇致严范孙的感谢信，体现了严范孙支持张謇办养老院的善举，以及扶持慈善事业的实际行动。

张謇作《吴县张仲仁云转昆季寄家天津，为其太夫人八十生日征诗》

1916年9月13日，张謇写了《吴县张仲仁云转昆季寄家天津，为其太夫人八十生日征诗》：

大儿呼孔小儿杨，何以元方与季方。
孝友承先周小雅，严明奉母蜀华阳。
中原朝市纷棋局，北海宾僚酒满觞。
愿祝老人过百岁，还吴掷米看沧桑。^[2]

张謇《复直隶义赈会函》为北方遭灾捐款

1920年10月，张謇《复直隶义赈会函》，为北方遭灾捐款。内容如下：

敬复者：北省奇灾，闵恻已久。比在海上与纺织业、银行、钱庄、铁业等合组赈会，筹款实行工赈。南通所捐之数约十分之一或二三，苦无余力可及他团体。承寄直隶义赈会捐启二

十册，谨以奉还。幸鉴及之。^[3]

民国十一年（1922）十一月十日，张謇在日记中写到其子“怡儿由宁去津。与怡儿讯，寄交通行钱新之转”。十一日，“怡儿至天津”。^[4]

张謇《致天津〈东方时报〉馆函》

1924年5月5日，张謇在上海《申报》发表了《致天津〈东方时报〉馆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昨由京友裁寄贵报一则，题为“三千万导淮借款，预定就瓜分计划”其标目则曰齐变元得一千万，以为副座经费；张謇得一千万，弥补亏累；政府亦得一千万，云云。阅之不胜诧异。论中国目下报纸，除一二间又论价值外，纷纷报纸，大都同党伐异，淆乱黑白，本在不足齿数之列，然以为此我国无聊赖、无意识人所为耳，不意贵报亦诬罔若此。贵报有何作用不可知。个人名誉受损，则依公例须请更正。鄙人之注意导淮事垂四十年，实行测量而计划者亦十余年。鄙人所发表之先后标本计划凡二种，治本须六千万，治标须七百万。治本之说，美测量团来华勘视以为未足，增为八千万。鄙人知此计划之不易实行，乃于十年大水后主治标之说，华洋义赈会勉之。今岁二月间，皖派考察员自美回华云：美下院有动议退还庚子赔款之一部一千五百万美金之说，二读通过，方在考虑用途中。同时美工程师费礼门，亦有函询问我国近日导淮问题之事。鄙人据所见闻，以所欲言者，函致全国水利局江总裁，

[1]《张謇全集》第二卷，第325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张謇全集》第五卷，第197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3]《张謇全集》第二卷，第437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4]《张謇全集》第六卷，第785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请为要求退还赔款，供给导淮工程之运动。函中所云，曾付报纸披露，计贵报馆人必有见及者。贵报所谓与导淮历史上最有关系者，此其经过也。至所谓督办云者，本无欲取之心，何有让人之美？所谓淮款者，系指退还而言，何有借款之说？至鄙人所营南通实业停滞，南通农工业荒歉四年，本未自讳，顾有公司、有股东、有办事人、有帐略；鄙人所任者公仆，非私人亏累，何劳弥补？尤可骇者，涉及儿子之出处。儿子之使行，于淮何关？今始信无意识人，不仅中国为多也。贵报既凿凿言之，当有所本，当有凭证，请为尽情披露；否则请即日更正，声明误会。时局虽纷，事实难诬，公论自在，法律自在也。此致东方时报馆编辑部。张謇。^[1]

上述内容，张謇列举事实，批驳了天津《东方时报》登载的“三千万导淮借款，预定就瓜分计划”。其中就“张謇得一千万，弥补亏累”的不实之词。

张謇《复旅津江苏同乡会函》

1924年，江浙发生齐卢战争，苏州、松江、常州等县沦为战区，江苏旅津同乡会请张謇出面斡旋。张謇经过斡旋，也无能为力，并就其结果，在1924年9月15日《复旅津江苏同乡会函》，全文如下：

敬复者：昨得快邮代电，诵悉。诸君子热忱公义，流溢行间。至佩至佩！下走江海野人，厌闻时事，偶有管见，质言披告，尽在我者而已。奈再三之告无效何也！苏、松、常、太不

幸竟为战区，人民流离奔迸，惨不忍闻。所馨香颂祷者，早日得和平解决耳。复颂公祺。^[2]

齐卢战争，就是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一场混战。1924年9月，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遵奉曹锟、吴佩孚意旨，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混战。直系获胜后，齐燮元兼任淞沪护军使。

张謇在这封信中呼吁江苏旅津同乡会同人，尽个人所能，为平息这场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而出力。

张謇致函张树声 谈罢应抵津

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二日（1882年9月4日），张謇致信张树声，告之日本军队的动向：

据天津僚友所述，日人调集水陆各军，将有逞其大欲之势。^[3]

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张謇致信张树声，告知李罢应善于机变，注意应之：

今日得雨亭溜启，始知其同傅相北来，并偕眉叔乘威远往津海口，虽无事而水师各船岂可无调驭之人，甚用悬系。罢应抵津后，论说何如？此人极机变，必有强辞申辩之事。长庆昨见国王，坚以太公护行官趁船往津为请，因其甚笃，遂姑应之。^[4]

雨亭，是丁汝昌的字。张树声，时署理直隶总督。眉叔，马建忠的字，江苏丹徒人，助

[1]《张謇全集》第一卷，第582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张謇全集》第一卷，第585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3][4]《张謇全集》第一卷，第9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李鸿章办理洋务交涉。

傅相为李鸿章。李鸿章为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时丁忧在籍守制。

张謇致函张树声的背景是：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出兵，欲图干涉，吴长庆驻军登州，奉命率师入朝定乱。吴长庆与张树声配合默契，赴机迅速，使兵变得以早日平定。乱首朝鲜国王生父李罡应被监送至天津，日本野心未能得逞。

不久李罡应监送到天津后，由李鸿章安置于保定居住。

涉及天津

张謇的日记中涉及天津的人和事也颇多。现据其日记，披露如下：

光绪十年（1884）

闰五月十六日（引者按：7月8日）写字，录汉文。闻法船三泊烟台，四过厦门，我师船皆退守旅顺、天津各口。^[1]

六月二十四日（引者按：8月14日）吴良儒自天津烟台返，横以先后所存谦益堂薪水目之公项而私顿（公项出入有定数可稽清，公项出入之数则可断所存之公私，而一切不省），因以为柄，益指恕堂手讹舛之帐，为侵蚀之证，而诬叔兄为扶同，并及于余与曼君，冀一网打尽，此则诸吴与群小之心事而出诸口者。^[2]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引者按：1886

年5月1日）得延卿到天津讯。^[3]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一日（引者按：1887年5月3日）为陈哲甫临魏碑八纸寄日本。^[4]

光绪二十年（1894）

六月十二日（引者按：7月14日）与叔兄、肯堂天津讯。

七月四日（引者按：8月4日）天津焦某寄来朝鲜图。

八月二十九日（引者按：9月28日）闻常熟（引者按：指翁同龢）奉懿旨至津诘问，而言者以为议和，颇咎常熟。且有常熟颇受懿旨申饬主战之说，其实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常熟处此固不易，要亦刚断不足。

九月十四日（引者按：10月12日）叔兄以江西巡抚委往天津坐探军事。^[5]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四月二十一日（引者按：5月15日）闻天津和议成，和约十款：一、韩自主；二、割全台、奉天九州县；三、换约后三个月撤军；四、赔二万万两，换约后半年还五千万，再半年还五千万，余六年清还，加息五分；五、苏、杭、沙市通商；六、内地皆通商；七、两月内派员会同划界；八、驻兵威海，每年给兵费五十万，赔款清后撤；九、俘虏彼此送还；十、限六个月议通商详款，现停战期满，展限至四月十四日，以便期内换约。盖赔款割地之辱兼之。见台民愤抗布告天下之文。^[6]

五月二十三日（引者按：6月15日）得

[1]《张謇全集》第六卷，第228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张謇全集》第六卷，第231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3]《张謇全集》第六卷，第263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4]《张謇全集》第六卷，第270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5]《张謇全集》第六卷，第364—368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6]《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3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莫枚臣讯，知导岷以五月客死天津。^[1]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八月九日（引者按：9月24日）闻各国船集天津，诘译署问上病状。^[2]

光绪三十年（1904）

七月十五日（引者按：8月25日）叔兄以十四日启行去沪，不日与禹九同去天津看分厂纱机，今日可至沪矣。^[3]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引者按：1910年7月3日）观直隶别馆，颇觉袁（按：指袁世凯）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4]

民国三年（1914）

三月二十一日（引者按：4月16日）诣比前驻津领事狄西业（按：张謇在北京）。^[5]

民国六年（1917）

四月十七日（引者按：6月6日）回别业。闻天津有临时政府之说。^[6]

民国十一年（1922）

十一月十日（引者按：12月27日）怡儿由宁去津。与怡儿讯，寄交通行钱新之转。

十一日 怡儿至天津。^[7]

民国十五年（1926）

五月二十三日（引者按：7月2日）怡儿电，是日由京至津，乘京浦车。^[8]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张謇的一生与天津的关系竟然如此密切。其一，据笔者粗略统计，张謇往返津门最少有十五次，许多地方留下他下榻的印迹，如三顺店、水师营、中和栈、佛照楼、春元栈、永和栈、德元栈、中和旅馆、塘沽旅所、德义楼等。这些虽然今天已不存在，但作为像张謇这样的名人涉足之地，仍然有其研究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其二，张謇在天津曾写有许多书信，如1880年在天津就给亲友写了三十四封信。可想而知，其十五次往返津门究竟写有多少封信，也需要挖掘、统计，而这些内容都是研究他在天津活动的重要内容。其三，张謇在天津会晤了许多重要人物，如清军将领丁汝昌、直隶总督张树声、直隶都督张金波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其四，张謇参观了天津罪犯游民工厂、天津图书馆等，当时有谁陪同？讲过什么话？对他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值得挖掘和研究的内容。其五，张謇与严范孙、梁启超以及旅津江苏同乡会的关系，本文记之甚略。这些内容也都是深入挖掘、研究的课题。因此，本文仅是提供了张謇与天津关系的一个基本线索，有待于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以便丰富扩大天津地方史研究的领域。

（作者单位：民革天津市委员会）

[1]《张謇全集》第六卷，第372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2]《张謇全集》第六卷，第413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3]《张謇全集》第六卷，第532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4]《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36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5]《张謇全集》第六卷，第690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6]《张謇全集》第六卷，第728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7]《张謇全集》第六卷，第785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8]《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26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明代天津卫“黄回子”辨析

尹忠田

“黄回子”一词，最早见于（康熙）《天津卫志》一书，据《天津卫志》所载：“黄回子，临淮人。”^[1]但是，历代天津地方志关于黄氏的记载不尽相同，例如：（乾隆）《天津府志》^[2]、（光绪）《重修天津府志》^[3]、（乾隆）《天津县志》^[4]皆记为：“黄回”或“黄回，临淮人。”然而，（民国）《天津县新志》^[5]的撰述者高凌雯，博览群书，广征博采，不论是官修文献，还是私家笔记、谱牒、碑刻等资料，遍览无遗，几经校刊，确认应记为：“黄回子，临淮人。”

明代永乐二年，天津设卫建城，调来官军两籍，户口渐繁。期间，天津左卫指挥僉事黄氏世家的先人莅临津门，因为生活习惯特殊、少数民族特征明显，被时人称为“黄回子”。而他的真实名字却被忽略，致使历代地方文献对他的记载，产生了“黄回子”或是“黄回”之误。那么，“黄回子”一词确指何人？黄氏世家莅临津门的第一位指挥僉事到底是谁？他确切名字叫什么？让我们通过此文，对天津左卫指挥僉事黄氏世家的来龙去脉以及第一位莅临

津门的黄氏先人的名讳给予探讨。

一、黄氏《卫官世袭表》

（民国）《天津县新志》的编撰者高凌雯为了勘误旧志，编撰新志，收集资料，旁征博引。然而，收集资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采访之难，犹有数因。……考证之勤，厘剔之劳，安得因其细小而遗之也。”^[6]他查阅的典籍有：《东华录》《谕折汇存》《政治官报》《曾文正公集》《李文忠公集》《耆献类征》等。至于旧家朱卷，其数不计。还有各家谱牒，有资考证，收入人物传中。搜集碑文为旧志所无。借书五百余种，多为乡人著作。而官册、学册、旌表册、历年缙绅、各府州县志，其数亦不计。“凡出函六百二十余种，收函五百二十余件。”^[6]足可见其竭尽全力，不避辛劳，广收博采，史料丰富，为编撰《天津县新志》所用。

高凌雯在《天津县新志》中，对天津左卫指挥僉事黄氏世家的记载颇为详细。他参阅了《黄氏宗谱》以及碑刻等资料，整理出黄氏世家的《卫官世袭表》。现将《卫官世袭表》附录于此，作为基本资料，为了表述后面的问题，更

[1]（康熙）《天津卫志》卷之二：官籍（即籍贯）；清·薛柱斗撰修，高必大协修，康熙十三年（1674年）梓行。见《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来新夏、郭凤岐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下略。

[2]（乾隆）《天津府志》卷之十五：兵制志，附职官；清·程凤文修，吴廷华撰，乾隆四年（1739年）刻本。

[3]（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十一：考二，职官二，历朝；清·沈家本等修，徐宗亮等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4]（乾隆）《天津县志》卷之十二：田赋志，附户口、屯田、官籍；清·朱奎扬等撰修，乾隆四年（1739年）刻本。

[5]（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之十七之三：职官（三），《官籍表》；高凌雯撰，民国二十年（1931年）刻本。

[6]（民国）《志余随笔》，卷一；高凌雯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天津金氏屏庐刻本。

加一目了然、迎刃而解。

《卫官世袭表》^[1]：

[三卫官制，自指挥使以下俱许承袭。]

黄氏（直隶临淮县人）

一世 黄回（燕山左护卫右所总旗，卒无嗣）

二世 黄胜（回从子，袭总旗，升至凤阳府留守中卫指挥僉事；永乐二年调天津左卫掌卫事，授明威将军。卒无嗣）

三世 黄镇（胜从子，宣德元年袭指挥僉事，授明威将军。卒无嗣）

黄钊（胜弟全得子，字德威，正统三年袭指挥僉事，任京营把总，成化间回卫掌卫事，授明威将军）

四世 黄溥（钊子，成化二十二年袭指挥僉事，授明威将军）

五世 黄东（溥子，袭指挥僉事，掌卫事）

六世 黄炳（隆庆间袭指挥僉事。案黄氏宗谱至此中断，兹据关王庙碑补）

七世 黄堂（袭指挥僉事，授明威将军。明亡职替）

二、黄回的官阶是总旗，卒于燕山

1.（民国）《天津县新志》的正确记载。

据（民国）《天津县新志》的黄氏《卫官世袭表》所载：黄回卒于燕山左护卫右所总旗的职位上，他去世时并无子嗣。也就是说，黄回卒于燕山。

按照明代兵制，军户之家世代从军。黄回去世时并无子嗣，他的军籍只好由黄氏家族中的近亲属来承袭。

黄胜是黄回堂房亲属（即堂兄弟）的儿子，

他袭燕山左护卫右所总旗之职。黄胜累立战功，升官至凤阳府留守中卫指挥僉事；永乐二年，调天津左卫掌卫事，授明威将军。也就是说，黄胜袭任的是黄回的总旗职。

2.（民国）《志余随笔》对如上正确记载印证。

据（民国）《志余随笔》所载：“黄胜以燕山卫所总旗，从靖难军立功，累升指挥僉事。永乐二年，调天津左卫，管卫事。”^[2]也就是说，黄胜以总旗之职起家，参加了明成祖发起的“靖难之役”，不避刀枪，冲锋陷阵；从总旗、百户、千户，一步步擢升为凤阳府留守中卫指挥僉事。永乐二年，天津设卫筑城，调来掌管天津左卫事。

3.《天津古代人物录》对如上正确记载的认同。

据《天津古代人物录》所载：“黄东，明天津人。其先人居临淮，伯曾祖黄胜，以燕山卫总旗从靖难军立功，授指挥僉事，调天津左卫。黄东袭职，掌卫事，以清廉著称；擢都指挥僉事，赐‘清风高节’匾。”^[3]

三、黄回和黄胜是两个人，不能混为一谈

黄回和黄胜是两个人，从黄氏《卫官世袭表》一目了然，无可厚非。黄回卒于燕山，根本不可能再出现在天津；然而，“积年故老讹传之误与旧籍载笔失实之疏者良多”，把这两个人混淆了。

1.（康熙）《天津卫志》的原始记载。

据（康熙）《天津卫志》所载：“黄回子，临淮人。”^[4]这个“黄回子”，指的是明永乐二

[1]（民国）《天津县新志》，卷十七之三，职官（三），《卫官世袭表》；高凌雯撰，民国二十年（1931年）刻本。

[2]（民国）《志余随笔》，卷三；高凌雯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天津金氏屏庐刻本。

[3]《天津古代人物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270页。

[4]（康熙）《天津卫志》，卷之二，官籍（即籍贯）；清·薛柱斗纂修，清·高必大协修；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梓行。

年调来天津左卫的指挥僉事黄胜。黄胜是一位少数民族，他在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各方面，与周边人群迥然不同。正因为他的少数民族特征明显，才被时人蔑称为“黄回子”。至于，其后人的民族成分或是民族族属的蜕变，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此暂且不论。

2. (民国)《天津县新志》发现问题。

据(民国)《天津县新志》所载：“黄回子，临淮人。黄回子，《谱》作黄回，与志小有异同。”^[1]发现了“黄回子”与“黄回”小有异同，正是这个“小有异同”，就是造成把两个人混淆的隐患。据《官籍表》所载：“明永乐设卫筑城，调来官军二籍，户口渐繁。”^[2]所以，这个“黄回子”，指的是明永乐二年调来天津的左卫指挥僉事黄胜。因为他是少数民族，所以，被时人蔑称为“黄回子”，已如前述。至于“《谱》作黄回”，自然指的是《黄氏宗谱》中的一世祖黄回。也就是说，“黄回子”指的是黄胜，他和《谱》中的黄回，当然是两个人。

3. (民国)《新校天津卫志》的校注。

据(民国)《新校天津卫志》所载：“黄回子，临淮人。(校注)府志县志均无子字。”^[3]这个“黄回子”，指的是黄胜。至于，“府志县志均无子字”，这个一字之差，非同小可。常言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是这一字之差，就是发生混淆的根源，“府志县志均无子字”，把“黄回子”误作了黄回。这里所说的“府志县志”，指的是(乾隆)《天津府志》和(乾隆)

《天津县志》。

四、“旧籍载笔失实之疏”

(民国)《新校天津卫志》在校注中发现了“府志县志均无子字”。以(乾隆)《天津县志》为例，看一看旧籍载笔失实而造成的舛误与讹传。

1. (乾隆)《天津县志》的舛误。

据(乾隆)《天津县志》所载：“黄回，临淮人。”^[4]“天津卫指挥：黄回，凤阳留守，永乐二年任。袭左卫指挥。”^[5]如上记载，只因少了一个“子”字，错误地把“黄回子”误为“黄回”，造成舛误而失实。

2.《河西区志》的讹传。

据《河西区志》所载：“黄回是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天津筑城建设卫时派来的首批千户之一。”^[6]这则记载有二误：其一，黄回的官阶是总旗而不是千户；其二，黄回卒于燕山而不可能再出现在天津。

《河西区志》在这则记载后面注明了依据：“资料一”和“资料二”。

资料一：《黄钊墓志铭》。

墓志记曰：“公讳钊，字德威，姓黄氏，世为凤阳府临淮县人。自大父起家武功，一再阴而至于公。”^[7]

这则记载过于简略，“大父”指的是黄回，省略了从黄回到黄胜再黄镇直至黄钊的许多事情，只用了一句“一再阴而至于公”。忽略了黄回卒于燕山时的官职是总旗，忽略了黄胜袭总旗

[1][2]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十七之三，官职(三)，《官籍表》；高凌雯撰，民国二十年(1931年)刻本。

[3] (民国)《新校天津卫志》，卷二，户口，官籍，官职附公署；清·薛柱斗修，冯允京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易社校印。

[4] (乾隆)《天津县志》，卷之十二，田赋志，附户口屯田官籍；清·朱奎扬等纂修，乾隆四年(1739年)刻本。

[5] (乾隆)《天津县志》，卷之十五，职官志(下)，[明]；清·朱奎扬等纂修，乾隆四年(1739年)刻本。

[6] 天津市河西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河西区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883页。

[7]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十四之一，《黄钊墓志铭》；高凌雯撰，民国二十年(1931年)刻本。

屡升至指挥僉事的史实。过于简略，不足采信。

资料二：《黄溥墓志铭》。

墓志记曰：“公讳溥，字伯宽，其先凤阳临淮县人，上世谱逸莫稽。曾祖回，值元季江淮兵起，高庙驻师濠上，因往从之，累立战功，升授千户。生二子，长胜次全；回老胜代，官至指挥僉事，注（驻）天津左卫。胜传钰，钰卒无子。”^[1]

这则记载有四误：其一，黄回的官阶是总旗而不是千户；其二，不是“生二子”，而是过继的“从子”；其三，不是“回老胜代”，而是回卒胜袭；其四，不是“胜传钰”，而是胜传镇；多处与《黄氏宗谱》不符。舛误频出，不足采信。

《黄氏宗谱》与《墓志铭》都是原始资料。然而，《宗谱》是家人自己撰写，记载比较详细，包括一些家族内部的隐私。例如，“卒无嗣”，过继“从子”为袭。所以，《宗谱》资料是优先得到倚重的，是足可采信的。

而《墓志铭》则是请人代写。虽然执笔者要听从墓主家人讲述，但其为了卖弄文采，追求文字上的功夫，只注重遣词造句，而轻慢了史实，就会出现取舍不当、详略失衡的现象。例如：“黄氏迁莹时，有黄钊墓志出土。钊为胜从子，承袭卫官，循分尽职，无可传之政绩。志文甚冗，所谓详而不要者也。”^[2]执笔者或许嫌墓主先人的“总旗”官阶太低，为了讨好墓主家人，让死人活人脸上都增光，笔下一挥，擢为“千户”，也是在所难免的。再则，执笔者把墓主家人的话当作耳旁风，一不小心写作了

“胜传钰”，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尽管其同样是原始资料，《墓志铭》的史料价值则略逊于《宗谱》。

《河西区志》所载：“黄回是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天津筑城建设卫时派来的首批千户之一。”虽然，其在文后注明了依据为“资料一”和“资料二”，但是，其对所依据资料的认读、理解和采用存在明显不足。资料二《黄溥墓志铭》铭文记载：“回老胜代，官至指挥僉事，注（驻）天津左卫。”笔者认为，黄胜代替了黄回的官职后，擢升为指挥僉事，然后才来到天津左卫黄胜是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天津筑城建设卫时派来的首批指挥僉事之一。

五、综述

笔者认真仔细阅读了《志余随笔》《天津县新志》等地方志文献，依据以《黄氏宗谱》为基础素材而整理出来的黄氏《卫官世袭表》作为基本资料，对上述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黄回的官阶是总旗，卒于燕山。2.黄回和黄胜是两个人，不能混为一谈。3.黄胜是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天津筑城建卫时派来的首批指挥僉事之一。

学史者必读《史记》，学习太史令司马迁发奋著述的坚毅和他对每一个字的敬畏、责任与担当。治学天津地方史者必读《志余随笔》，学习乡贤高凌雯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严肃的治学态度、严格的治学作风。笔者愚钝，偶得是篇，一得之见，未必定论，敬请方家赐教。

（作者单位：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会员）

[1] 《黄溥墓志铭》，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2] （民国）《志余随笔》，卷三；高凌雯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天津金氏屏庐刻本。

赵生甫与城南诗社

侯福志

赵生甫（1883—1934），名芾，字生甫，号蒙斋，祖籍天津北仓。画家、诗人、古文家。诸生。曾在北宁铁路局工作，后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职。晚年曾在陈一甫家馆担任教师。性笃挚，博极群书。以治古文名于时，有《蒙斋文存》一书存世。此外，他还随其师王仁安参与过《天津县新志》的编写工作，在天津历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

关于籍贯。1929年，马仲莹在《城南诗社小传·赵芾传》一文中曾有记载：“赵芾字生甫，天津人，原籍武清，清给谏赵之符裔也。诸生。公府秘书。著有《蒙斋文集诗集》。”赵芾曾为《李氏家谱》作序云“余先代亦自江南迁居津之北仓”。赵之符乃今北仓人，北仓原属武清县管辖，雍正九年（1731）改隶天津县。

关于艺术成就。赵生甫的好友王揖唐在《今传是楼诗话》第二百九十二则中曾做了披露：“天津赵蒙斋芾，一字生甫，能为桐城派古文，创北菁学舍，以古文诏后学，从游者盛。诗不多作，《津上道中得句》云：‘惭愧追锋车疾转，不婴尘网果何人。’有物外之致。又和余‘之’韵诗见柬云：‘四方蹙蹙怅何之，犹幸中丞数举卮。绿野堂前多旧雨，浣花溪上有新诗。云霄翔凤鸣仍急，风雪潜龙蛰未知。下榻剧怜徐孺子，南州诘许久栖迟。’亦举止深稳。如其为人。”

关于卒年。金钺的《屏庐文续稿·赵君生甫传》曾言：君“年止五十有二……所著有《蒙

斋文存》五卷刊行。君没逾十年，君之子迟元粗具事略，属予为文”，故“援述其文章卓卓之可垂诸不朽者，濡笔而为之传。甲申（1944）孟秋”。由上述文字推断，赵生甫应当卒于1934年。

除王揖唐提到的诗作外，目前见到赵生甫的诗作还有1925年出版的《城南诗社集》所收录了两题三首诗。其一题为《次子通先生韵》，共两首。第一首云：“新诗一读两眸开，细雨潇潇津上来。把酒停云陶令宅，垂纶避世子陵台。钟磬自古无凡响，坛坫于今属霸才。留滞何须怨迟暮，养生庄叟善论材。”

“新诗一读两眸开，细雨潇潇津上来”说的是作者与吴子通经常在一起唱和的事情。而“坛坫于今属霸才”一句，是作者对吴子通在诗坛地位的评价。吴子通是城南诗社创始人之一，在其入社后的20多年时间里，自始至终参与城南诗社的社集活动，虽不是社长，但有“襄助一切”之功。故在城南诗社地位相当高。

第二首云：“元纬路前逢细雨，文昌宫畔喜初晴。晚春花草饶新态，季世风骚有正声。广座联吟知雅趣，萧斋叠韵见深情。儒冠只合封诗伯，津上高吟且载盟。”这首诗，描绘的是城南诗社雅集的情景。城南诗社经常在元纬路附近的河北公园以及文昌宫附近的蟬香馆（严范孙书斋）雅集，“儒冠只合封诗伯”，同样是对吴子通诗才的高度评价。

其二题为《次家幼梅兄夏日游公园韵》。

诗云：“寂寂空知守旧林，连朝诗酒倍情深。寄情且喜名贤集，真乐仍应我辈寻。花木萧疏忘世味，贞元剥复见天心。满园名卉芬芳甚，津上诗成且独吟。”这首诗同样是记述城南诗社雅集的情景。“连朝诗酒倍情深”，是说作者与赵幼梅等师友们经常相聚，因此，感情愈来愈深厚。对于作者来说，城南雅集很难得，尤其是赵元礼这样的津门耆宿经常出席活动，能够给大家带来知识和美好的享受，是一种“真乐”。

赵生甫最大的成就还在于他的古文创作，其成就远胜于诗，并为时人所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名人的传记或墓志铭均出自他的手笔，据1933年陈诵洛作《蟬香馆别记》载：“赵生甫，擅古文，公（严范孙）语之曰：‘为文宜凡事直书。’”1935年2月，赵元礼在《蒙斋文存》第五集序文中曾云：“族弟生甫，性笃挚，博极群书，以治古文名于时，为桐城陈剑潭、新城王晋卿及吾邑徐弢斋（世昌）所甄赏……惜其中寿以疽发背死。家贫子幼，环堵萧然。”

严智惺（字约敏）是严范孙的侄子，向为严范孙所最钟爱。癸丑（1913）病歿（为庸医所误），年仅31岁。严范孙曾作挽联云：“吾家第一可意人，叔侄情亲逾父子；终身不忘痛心事，丹砂祸惨甚刀兵。”李琴湘亦挽以联曰：“不幸斯人，比颜氏子少一岁而卒；何堪乃叔，有韩文公十二郎之悲。”为悼念严智惺，赵生甫专门撰写一篇文章发表在1913年第1卷19号《庸言》上。这篇题为《严智惺先生事略》的文字，概括了严智惺的简短但不平凡的一生，这是迄今为止，有关严智惺最为完整的传记文字，为后人研究严氏家族提供了珍贵史料。

曹彬孙是王庆坨人，宣统年间曾为奉节知县，在清末守城时遭袭殉难。他为官清廉，殉

难之后，因家里没有一点积蓄，其灵柩只得暂厝于某寺庙中。后以忠烈故得到襄助，灵柩才得以运回故里。赵生甫系曹彬孙的表弟，为曹彬孙的忠烈事迹所感染，特撰写了《清四川奉节县知县曹君殉难碑记并铭》及《闻曹蔼臣姻兄祀乡贤有感》一诗。上述两篇作品载于曹彬孙后人整理的《寄傲轩诗钞》中。据赵生甫自述，民国元年（1912），赵生甫正客于松花江上，在得知曹彬孙殉难的消息后，“既为诗七章，哭之其后”“又尝欲为文以志君墓，而人事乖忤，久不就”。1924年春，曹彬孙次子用杰请其撰写碑铭，因赵生甫近来身体多疾，怕耽搁大事，乃“亟之铭”。铭曰：“严严蜀疆，无道先强。值时棘难，睚眦豺狼。仡仡曹君，秉彝于刚。思靖一邑，抑桀扶危。世乱方亟，卒膏凶铍。文武道尽，天固难详。靡远弗届，靡幽弗光。千秋万禩，令闻不亡。”

陈一甫是著名的实业家，他与陈范有一起曾长期在启新洋灰公司任职，并创办了著名的江南水泥厂，为中国水泥工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天津人雅称为“洋灰陈”。赵生甫曾在陈一甫家馆任塾师，陈一甫的长子陈范有即随赵生甫学习。后赵生甫撰写了一篇古文，题为《居敬轩记》，记述了自己在陈一甫书斋里的所见所闻。这篇古文被收录在他的《蒙斋文存》一书中，已成为研究陈一甫的重要实证资料。除以上所述外，赵生甫还有一些古文很知名，如《天津严公范孙墓碑铭》《赵母郭夫人传》（赵母即赵元礼之妻）等。

赵生甫是城南诗社早期成员之一。城南诗社创立于1921年初夏，是民国时期津门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初由严范孙任担任祭酒。1929年春，严范孙去世后，继由赵幼梅担任社长。因其体弱多病，后改由管洛声主持。所考证，自创立至20世纪40年代末解散为止，累

计加入的文人多达 200 余位。据吴子通发表在 1939 年 11 月 23 日《新天津画报》上的《天津城南诗社源流》一文载，1921 年 3 月 25 日，严范孙曾在“蟬香馆”设宴款待诸师友。当晚参加宴请的除吴子通外，尚有冯俊甫、王仁安、赵幼梅、李琴湘、刘竺生、赵生甫、林墨青、严台孙等。这次雅集，实际上是城南诗社创办前的一次聚会。另据《严范孙日记》一书载，1921 年 5 月 1 日，严范孙召集王守恂、李金藻、吴子通、赵元礼、赵生甫、陈汝良、严侗在其寓所雅集。此时，城南诗社刚刚成立不久。根据上述史实推断，赵生甫应当是最早加入城南诗社的文人，甚至可以认为，赵生甫实际上就是创立会员之一。

赵生甫除与严范孙、吴子通、赵元礼、王仁安唱和外，还与城南诗社的另外一位大家徐石雪存在交集。徐石雪在其 1926 年刊印的《石雪斋诗稿》一书中，曾收录了题为《蒙斋图为赵生甫先生带作》的一首六言诗，对赵生甫包括绘画、金石在内的创作成就评价颇高。诗云：

“四壁图书金石，一家班左韩欧。占尽蓝田幽胜，个中自有千秋。任道近同拙老（王仁安先生号拙老人，闭户著书，生甫尝从之游），移风远媲文翁（生甫创北菁学社于津门，以古文诏后学）。何日比邻许结，往还亲炙春风。”而赵生甫在为《石雪斋诗稿》所作的序文中，对徐石雪评价亦很高：“君独萧然物外，淡而无闷。其诗既不屑摹拟古人，启华振秀，静深冲淡，秀而不纤，肆而不莽，故虽单词短语，亦风蕴清远，往往可诵。”他还提到严范孙对赵生甫的器重：“严尚书范孙亟激赏之，且称其才志与境地，近人殆罕与俪者。”

1934 年，赵生甫去世时，李琴湘曾撰《挽赵生甫古文家》一联以示悼念。这副挽联，概括了赵生甫不平凡的一生及创作成就。联云：“上交极于名公巨卿间，纵然尊若宾师，总觉风尘知己少；古学不在桐城阳湖下，惜未发为经济，终伤文字乞灵难。”该联收录于 1938 年由姚彤章辑印的《择庐联稿》中。

（供稿单位：武清区地方志办）

（上接第 31 页）

立目辈分要清，领属要得当。节与目，目与子目是上统下辖关系，简单说要厘清辈分。例如《司法志》复审稿第三章第一节调解组织记述较乱，修改时建议此节下设调解委员会、司法调解中心、其他调解组织、调解经费四个目，体现节、目间从宏观到微观，上统下辖层次关系结构。最后，部门志、专业志子目设置不宜太细，建议不要按照业务分工、职能分类设置。此外，横排门类不要以为分的越细越好，立一个门类就要纵写始末，但由于资料支撑不住，整体事物分解割裂，有限的资料你争我夺，形成碎片化，哪个也记不全。一般情况下应尽量减少层次，扩大竖写单元。《公安志》《农业志》复审稿

章、节、目、子目、孙目等设置过细，有的子目只记了一年一件事，一类事物不能完整记述，造成内容交叉重复；缺失上下限或断限情况较多；体量庞大，修改时应规避此等设目方式。

总的来说，部门志、专业志志稿修改是一个循环往复且漫长的过程。修志者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以修史修志为己任”的历史担当精心修改、补充完善志稿，严格把握政治关、体例关、质量关、史实关、文字关、保密关，记述彰显该志的特色与亮点，避免各类问题的发生，力争编修出存史价值大、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可读性强的精品佳志。

（作者单位：北辰区档案馆）

说说天津的三个“官房村”

王庆普

天津地名中有“官房”字样的，大都与旧时政府官员在此建造房屋有关。天津城里有南开四马路原有街巷名“官房子”，红桥区先春园街道有“官房胡同”和“官房西胡同”。天津城外滨海新区新城有个“下官房”，大港有个“前官房”，这两个“官房”都是人家很少的自然村，至于为什么叫“官房”，也因缺乏史料记载，而无从考证了。倒是天津境内另外三个叫“官房”的行政村，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相关史料记载。它们分别坐落在东丽区和津南区。这三个地方为什么叫“官房村”，它们和旧时政府官员有关联吗？

一、官房村

官房村位于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两侧，东与新五村接壤，西至小北庄，南与新袁庄为邻，归属东丽区无瑕街道，于清光绪末年建村，曾从属新袁庄。

说起官房村的村名来历，要从清末光绪年间的吉林督军孟恩远说起。据津南区《双桥河镇志》记载：孟恩远（1858—1933），是现今的津南区双桥河镇西泥沽村人。他从小家贫，以务农为生，长大后以替人撑船为业，后来因一次打架斗殴逃到小站投军，成为袁世凯麾下的一名小兵。孟恩远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但是胆子大，头脑好使，且身体强壮，总是有使不完的力气，在练兵时操练最勤快，不到几年就习得一身好武艺。

在一次大练兵中，孟恩远因为骑射功夫好，头脑又机灵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从此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后在袁世凯的保举下步步高升，

1916年7月，任吉林省督军。孟恩远到吉林后，招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嫉恨。孟恩远的到来成为张作霖作“关外王”道路上的最大阻碍。张作霖多次设计将孟恩远赶出吉林，都没有成功。后来张作霖策划了“宽城子事件”，在长春的孟恩远吉军与驻守满铁附属地的日军爆发了军事冲突，双方死伤数十人。面对日方的强烈抗议和张作霖的逼人态势，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迫于无奈，于1919年6月授予孟恩远惠威将军，调京供职。孟恩远见失去了实权，大势已去，同年8月13日，辞职回津，结束了军阀生涯，隐居租界。张作霖借日本人之力将孟恩远赶下台，成为真正的“关外王”。

据东丽区文史资料《正在消失的村庄》介绍，孟恩远虽然被张作霖赶出吉林，寓居天津，但在天津仍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天津的大官见了都要让他三分。回到天津后，孟恩远开始建厂买地，在东郊与南郊买下四块地，并招来佃户为其种地。在东郊买的几块地上建了几间房，并规定“不管是谁，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居住”。因为这房子是免费供人居住，就像官家的避难所一样，因此佃户们称这块地为“孟家官房”。

给孟恩远种田干活的佃户来自周围30多个县、50多个村，孟恩远委托小宋庄的黄文良替其收粮收租。孟恩远虽是个毁誉参半的大军阀，但他从不欺负乡里，给佃户定下的交粮交税标准也比较合理，佃户们交完赋税官房之后，剩下的粮食都能满足温饱，于是这些佃户在此定居，繁衍后代。后来，住户愈来愈多，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官房村”。

由于官房村位于其他两个“官房”的下方，所以又被称为“下官房”。后来“下官房”土地被转卖给新袁庄地主赵花元等人，于是“下官房”成为新袁庄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东郊区建行政区，“下官房”被划为新袁庄管辖的一个自然村。1981年，“下官房”与新袁庄的笑里洼子、袁家洼子（这两处都为新袁庄地主的土地）一起从新袁庄中分出来，合并成为“官房村”，有610户，1560人，耕地面积636亩。随着示范镇建设，官房村整体拆迁，已经不存在了，村民搬入无瑕街道的新建社区。

二、东官房村

东官房村位于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津沽公路南侧，东至营房道、西至小高庄村、南至大沽排水河、北至津沽公路，由官房、何家台、大营3个自然村组成。

葛沽镇所辖的东官房村和孟恩远将军没有关联，据《葛沽镇志》记载：“葛沽赵府在清朝顺治中叶任黄河道台，康熙年间在葛沽镇拥有大片土地，为管理土地及仆人歇脚、存放东西，在此处建房，俗称‘黄河道’，后来逐渐形成小村，以官家房子的含意，习惯称为官房。1983年地名普查后，为区别本区双桥河镇内的西官房村，故称为东官房村。”

东官房村何家台。1911年初，何芹轩在开滦煤矿做事时，在此处购地种稻，后来居住几户人家，俗称何家稻地，新中国成立后，人户增到十几户，称为何家台。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到七八十户。

东官房村大营。明代葛沽作为海防之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为军势险要之地。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为巩固海防，派军在葛沽、大沽驻守，在葛沽建营房，因距民居较近，常发生军民纠葛，后将营房迁至镇南二里许建立营房。路东侧为兵士住地，路西高台为首领住地，

机关名称为“葛沽、大沽营”，简称“大营”。在当地流传一句话“天津建卫，葛沽建营”。

大营的营房四周筑高墙，墙高一丈五尺，顶宽一丈二尺，南北长175丈，东西宽110丈，气势雄伟，非常壮观。营墙四角各有望楼一座，楼高于墙两层。大营四面各有营门一座。墙外有一条宽大的护河。南营门外有一跑马场，面积纵横70丈。这里便是海防军跃马驰骋、操练竞技的地方。跑马场四角各有一座观马台，台高丈许，纵横宽约三丈。海防大营内设有总兵一人，副总兵一人。总兵标下海防军总共约万人，其中骑兵1000人，正营海防军6000人，忠顺军2000人。他们平时分别驻扎在葛沽、大沽、泥沽、芦家嘴等地。定期到大营轮换操练。

据清代嘉庆年间葛沽文人白清轩《百草寻参》中记载：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曾出巡至葛沽大营。康熙皇帝在大营跑马场东北角观马台上，观看了大营海防军演练骑技，并登上东南角望楼，一展龙目。是夜，康熙皇帝住在大营总兵署迎宾厅内。

后来兵营撤离后，几户人家迁来在此居住，大营的官房名称延续下来。解放初期，当地村民盖民房挖土时，曾挖出过明清时代的青砖、陶瓷、拴马残桩等。1967年，因营房道拓宽，大营的住户分别搬迁到官房和何家台居住。

随着葛沽镇示范镇建设，东官房村的3个自然村都已不复存在，居民住进了葛沽镇慈水园还迁社区。

三、西官房村

西官房村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东北1.3公里，东至跃进河、西至双桥河、南至津沽公路、北至西泥沽村，是双桥河镇的一个行政村，由官房、孟家园、王家台、郭家庄4个自然村组成。

西官房村距孟恩远将军的老家西泥沽村近

在咫尺，孟将军的坟墓就坐落在该村内的西南方向，但村名却和孟恩远没有什么关系。据津南区《双桥河镇志》记载：“道光年间，一朝廷郎中在此建宫护院，并制造火药。后郎中病故，因家中无后人继承，将房产收为官有，成村后得名官房。1967年曾改为先锋村，1968年复原名。因为与葛沽镇境内官房村重名，又在葛沽以西，故于1983年地名普查后以方位定名，称为西官房至今。”

西官房所属三个自然村的村名也都有来历。孟家园，此地原是西泥沽村孟恩义家的菜地，1928年后村民在此建房居住，形成村庄故名至今。王家台，1915年只有12户人家。1928年后，人户增加成村，因王姓居多，村庄地势较高，故名王家台。郭家庄，明永乐二年（1404），郭姓四兄弟到此招工开荒种地，佃户逐渐增多形成村庄，故名。

西官房村是三个“官房”村中至今唯一保留的村庄，现有村民631户、1877人，耕地817.5亩。该村地处天津市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近年来，西官房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借助独特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治理“小散乱污”企业，发展名优特产及新兴的朝阳产业，建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农业专业合作社。同时在管理上实行网格化，以“一张网”兜住村内八大类约120项大小事项，实现人、物、事全覆盖，源源不断地为这个千年古村注入新的活力。现在的西官房村，环境优美，乡风和谐，产业兴旺。2019年，西官房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比2017年翻一番，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244元，超过了天津市平均水平，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以上三个“官房村”，除了位于东丽区的官房村与孟恩远有关外，另外两个村都与他无关，倒是在津南区双桥河镇东嘴村内，有一处名叫

“大官房”的房子，虽然少有人知，可它确是孟将军的“官房”。

早些年，东嘴村内的田地几乎全部属于孟家，为了收租、办公方便，便在村北头盖了五间坐北朝南的房子。此房青砖做奠，泥坯垒墙，地基建比房山西面的村里主道高出数尺，院中有棵一搂粗的大枣树。新中国成立后，此房分配给刘姓和孙姓两家村民居住，后因翻盖新屋，老房被毁。

另据光绪《重修天津府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北辰区西堤头镇刘快庄村西1000米处有一地名叫钱官房。钱官房也叫钱家房子，占地面积约为8000多平方米。据称，钱家住天津城里，在塌河淀西南方购置上百顷苇地。当初只建有看护苇地的房屋，后扩建成大片青砖瓦房，院内有三棵大杨树。钱家是天津城里有名的财主。偶尔同天津县官员、商贾、亲友、家人来此小住，也有称避暑、躲兵乱之说。从遗址土台上堆积的青砖和碗、碟、盆等碎片上看，均属细瓷制作，甚是高级，非一般平民所用。民国初期，钱官房归了广仁堂（也叫娃娃堂），成了专门收留弃婴和穷人无力抚养之子女的慈善机构。现遗址虽有，但遗迹已荡然无存。

参考资料：

[1]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双桥河镇志》（内部资料），2005年12月，第42—43页，第657—661页。

[2]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志》编修委员会编著：《葛沽镇志》（内部资料），1994年10月，第14—16页。

[3]天津市津南区政协文史委编辑：文史资料第十三辑《千年古镇葛沽》（第一卷）（内部资料），2007年12月，第174—176页。

[4]天津市东丽区政协文史委编辑：《正在消失的村庄》（中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2018年3月。

[5]《古往今来西堤头（十一）》，一和一学习网，2021年11月15日。

（作者单位：市津南区政协）

市地方志办召开市级部门未修志单位业务培训会

4月26日，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组织召开市级部门未修志单位业务培训会。市档案馆党委书记、馆长阎峰，党委委员、副馆长吴爱民出席会议，方志指导部党支部书记夏秀丽主持会议，全市35家未修志部门的负责同志参会。

培训邀请全国精品志书《天津市志·公安志》承修单位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宋中楠以《天津市志·公安志》编修为例进行授课。市委办公厅、市委老干部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市残疾人联合会等6家单位作经验交流。

吴爱民同志对志书全覆盖工作前期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各修志单位前一阶段的工作，同时就有关单位提出的志书上下限的确定、志书篇目设计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解答。

阎峰同志作总结讲话。首先讲述习近平总书记重视读志用志修志的事例和在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修志工作是技术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各单位领导要重视此项工作，摆正位置，结合工作实际推动；修志工作有内在规律，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是光荣的工作；修志工作者要甘于奉献，耐得寂寞，立志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要众手成志，各部门要凝聚在一起通力协作。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会做好服务，全力以赴为推动修志工作顺利开展做好保障。

与会人员一致表示，此次培训会解决了他们目前亟待解决的很多问题。各单位面对面交流使他们对一些工作流程、方法更加明确，对今后修志工作开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市档案馆方志指导部）

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组织召开全市专业年鉴编纂工作推动会

6月14日，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组织召开全市专业年鉴编纂工作推动会，这是天津市召开的首次全市专业年鉴工作会议。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党委委员、副馆长吴爱民出席会议，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成员单位地方志工作部门负责人及其他市级专业年鉴编纂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明确方向，推动发展。年鉴指导部负责同志作了《勇于担当 善于作为 努力开创天津市专业年鉴编纂新局面》的报告。市教育委员会、市统计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天津海关分别作了经验交流。

随后，参会人员就扩大市专业年鉴编纂

范围、提高专业年鉴编纂质量等主题讨论发言。大家表示，通过此次会议充分认识到编纂专业年鉴对于留存、记录本部门、本行业发展历程的重要性，增强了做好专业年鉴编纂工作的紧迫感，会后将及时汇报会议精神，争取尽快启动本单位年鉴编纂工作。

吴爱民同志对年鉴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自觉承担历史责任，将编纂好各单位年鉴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二是迅速将编纂年鉴工作提上日程，迎头赶上其他先进省市，为增强天津文化软实力做贡献；三是强化精品意识，提高年鉴编纂质量，更好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重要功能。

（市档案馆年鉴指导部）

北辰区召开部门志编修工作视频推进会

近日，为加强对区级部门志编修的指导和服务，加快编修进度，提升编纂质量，北辰区地方志办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了部门志编修工作推进会。区档案馆馆长王春玲、副馆长赵昕、23家部门志负责人和方志编修科全体干部共计3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各编修单位介绍目前志书编修进度、修志档案整理情况、经费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难点问题。方志编修科干部给参会人员培训了地方志编修资料归档范围及整理规范，赵昕就各单位的汇报进行小结并提出具体工作意见和建议。

最后，王春玲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勇于担

责。区委、区政府历来重视地方志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全国“两精两名”工程均有成果。目前部门志全面进入收官阶段，各单位要勇于担当，深严细究，把好志书“六关”，高质量完成志书编修工作。二是提速增效。各编修单位加快推进志书进度，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强化指导。区方志编修科要对各单位编修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加强指导与服务。根据防疫要求，以不定期开展视频会议、开展电话咨询、现场走访等多种方式，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时间表、路线图，确保在上半年全部完成编修任务。

(北辰区档案馆)

西青区首部“中国名镇志”——《杨柳青镇志》编辑出版

《杨柳青镇志》于2021年12月入选第六批“中国名镇志”丛书，并于2022年初由方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成为西青区首部入选全国名镇志文化工程的“中国名镇志”。

《杨柳青镇志》自2017年启动编纂，经过资料征集、初稿撰写、专家评审，数易其稿完成编纂。《杨柳青镇志》设立基本镇情、杨柳青年画、名胜古迹、杨柳青人赶大营、石家大院、风土民情、艺文杂记、名人与名镇、大事纪略等9个类目，对这座北方小镇的人文历史、特色建筑、独特文化以及风土民情进行集中记述，对古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进行了深刻地阐释，尽显“中国魅力文化传承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西青区地方志办以“文化强区”为要务，致力于推动、参与国家“双名”工程，

积极打造“名镇志”“名村志”品牌，不断提升区域影响力。充分利用方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功能，服务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继2017年《王兰庄村志》《凌庄子村志》完成首批“中国名村志”编写出版后，《精武镇志》《王顶堤村志》也已完成编写并进入出版阶段。目前，按照中指办“双名”工程最新实施方案，正在精心准备，积极组织张家窝镇、精武镇傅村等镇、村开展新一轮全国名镇、名村志申报工作。

(西青区地方志办)

